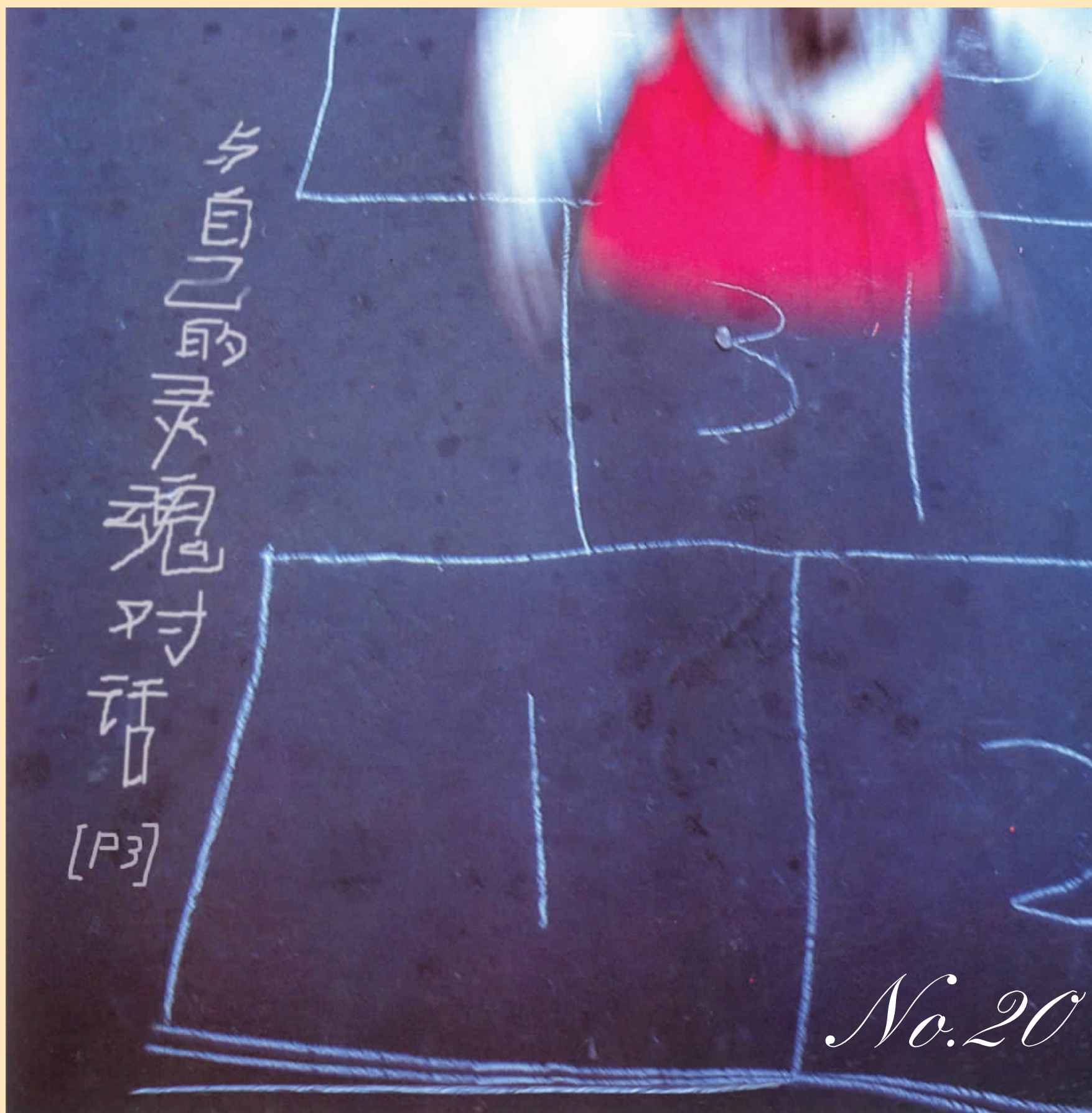


经济观察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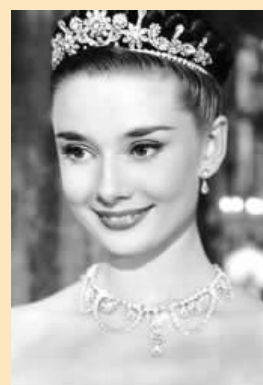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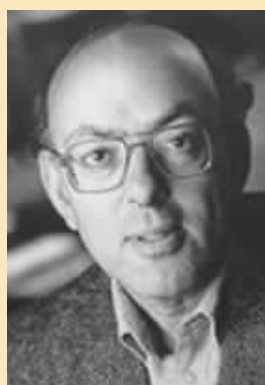
The Economic Observer's Review of Books

书评增刊



BOOKS

目录



P6 鲍曼:越界之旅 (杜庆春=文)

在中国大地上关于边界的再度确立和关于边界的记忆,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显著特征。不仅是围墙内的民工,还有庞大的群体都陷入“乡关何处”的集体乡愁中。这个现象是鲍曼无法深入讨论的,他注意到边界的消失,而没有注意到边界的痕迹,没有注意到对边界需求的心理惯性。关于边界的记忆成为自我身份确认和认同的关键方式,成为将漂泊的个体重新回到温暖集体的关键路径

P3 与自己的灵魂对话 邵颖波 = 文)

P4 赚穷人的钱并帮助穷人 赵晓 = 文)

P5 愉悦的思考 傅勇 = 文)

P7 巨人的难题 大卫·伊格内休斯 = 文 张一帆 = 译)

P8 在误解中前行 叶檀 = 文)

P10 历史的表述 威廉·菲利普 = 文 张艾 = 译)

P11 明茨伯格的挑战 肖知兴 = 文)

P12 中国式继承 康力 = 文)

财富梦想 何志毛 = 文)

P13 真正的执行 李东生 = 文)

P14 憎恨胡说 本·雅各达 = 文 于威 = 译)

P15 解析媒介当代迷思 胡正荣 = 文)

P16 童年·生死未卜 郭玉洁 = 文)

P17 优雅问题 吴海蔓 = 文)

P18 触摸一代人 李翔 = 文)

P19《告别演说》的难言之隐 连清川 = 文)

P20 置身电视 隆·莱博 = 文)

P21 黄集伟阅读笔记·六月 黄集伟 = 文)

P22 从混沌到有序 阿尔史·托夫勒 = 文)

P23 本期荐书 李翔 = 文)

经济观察报
The Economic Observer's Review of Books
书评增刊

NO.20

(赠品)

执行主编:许知远

编辑:张帆 方军 殷练

设计总监:邹波

美编:肖利亚 姜坤瑛

制作:吴艳霞

编辑部电话:8610-64209024-121

书评增刊网站:www.mindmeters.com

思维的樂趣
mindmeters

社址: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23号中银大厦22层

北京记者站:北京市东城区兴化东里甲7号楼(100013)

招商热线:65525326、65525315、65525323

传 真:65525466

网上购书独家支持媒体:

joyo.com 卓越网
超越平凡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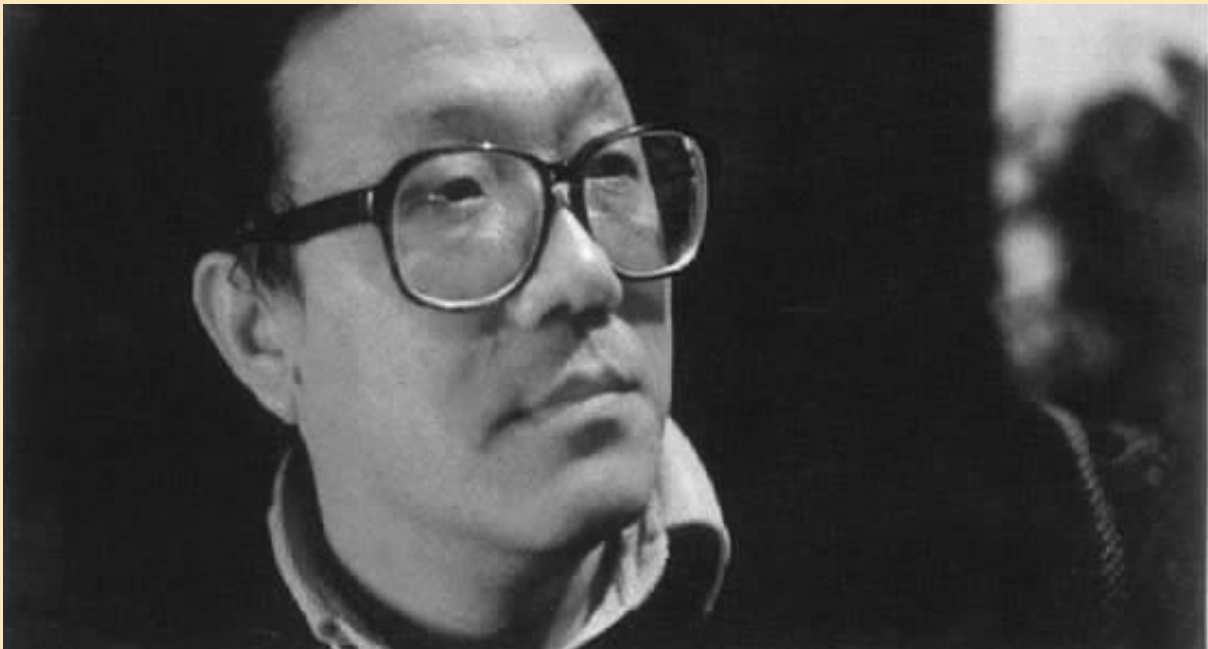
少 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可见书都是写给不同的人看的。那么,什么人才适合读史铁生的东西呢?可以肯定,他不是写给年轻人的,他所说的灵魂的事虽然精彩但却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不能让他们浮动的心感受到刺激,在年轻人的眼里它连一个成功商人的自传都比不上,更莫谈其它记录更伟大的事情的书籍。

老年人也同样不一定喜欢。因为这里面所有的似梦似真的话,在他们厚重的人生经验(那是一种浸入骨髓的东西,它控制人的力量比得上任何从理论出发的解说)面前是引不起什么兴趣的,这种东西说得再精彩、再深刻,对于他们来说都会无动于衷。我一向相信,每一位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人,那些行将就木的人,他们都是深刻的哲学家,不要以为他没有能力向你系统地阐述,便是浑浑噩噩地过了一生。他不说,那是因为他走的路已经太远,他累了,他懒得理你了,但实际上他的精神世界丰富着呢,他可以因此而鄙视一切,当然也会包括史铁生说的那些灵魂的事。

所以,我认为,《灵魂的事》这种书,是写给走到人生半途中的人的,是那些忙碌运转了二三十年,在内心里感到终于到了该解决那几个最基本的人生问题的人。这个年龄的人们,大多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耳边却不时地传来一种声音,轻轻地提醒着他现在应该沉静下来。总之,这种书最适合的读者就是和作者差不多年龄的人。

史铁生是个残疾人,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尽情参与物化世界。但是你呢,你虽然四肢健全,身心也健康,而你所受到的限制却并不比他少。你或许曾经干出过某些像样的事,或许没有;你可能认为你的人生正要步入辉煌,也可能早已感到疲惫。这些都没有关系,总之你就是处于这样一个人生阶段:既没有大彻大悟,也不是什么都不懂;既处于缤纷世界之中,也在它之外,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你办,但更有一种力量在跟他们对抗,使你尽量安静下来。你就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而这个过程本身说明,在心灵飞翔的时刻,你根本就没有一个身残者更自由。

必须说清楚的是,我一点都不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有什么深刻的理性思维,它不是。人们一向弄不清楚一个作家在创造一件文学作品时,是通过怎样一个幽暗的思考过程,即使是很短的一个小小说,作家本人也不能



与自己的灵魂对话



《灵魂的事》
史铁生/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年1月

几乎每一个段落都要让你联想到自己,最终你会明白,你不是他,你进入不到他的世界中去,你也不想费那个劲,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你所听到的,其实都是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在对话

为你倒叙它的产生过程。创作过程是神奇的,因此,当史铁生脱离开文学创作的时候,当他想要和我一样弄明白一些事情的原理的时候,他仍然保留着文学创作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是在用心灵指挥大脑。

什么样的人生是好的人生?回答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一开始还是要用些逻辑的、理性的方式。但是很快,通过一个理想的好运设计,你就发现人生的悖论开始层出不穷,你发现了一种好的人生,这是从别人那里看到的,然后你希望比他还要好,但即使是好到头了,你还是发现有很多不好,进而你又发现这是必须的,你要幸福但必须通过一些不幸来实现。你要辉煌就必得有些苦难来克服,然后你发现终究人生是一种失败,因为死亡总是无法克服,为了摆脱这种失败的阴影,你只好从最基本的地方出发,重新设定好的人生标准。

于是,过程本身的意义被抬举到先前所有的人生目标之上,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于是,你要继续思考这个过程里的一切东西,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爱情,什么是性欲,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悲苦,最后你会问到,到底什么是我?我是什么?是我的思想证明我的存在,还是我的肉体证明我的存在?我的思想是出自我的大脑,还是发源于我的心灵?我好像知道大脑在怎样工作,但是我的心灵藏在哪儿?为什么我总是听见它的召唤,却不知道,是它在召唤我,还是我在召唤我的心灵?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已经一连读了好几本克里希那穆提的文集,人们

称他为印度的大师,称他为心灵的导师,但是,若单从文学上的优美程度来说,史铁生更让我喜欢。他肯定还没有资格配得上心灵导师这样的称号,但为啥非要配得上呢?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同样高贵和自由的心灵,每个心灵都和世界本身一样大,除非你受到现实世界的限制故意地让它萎缩,让它麻木,让它长久地安眠。

忙碌的人总是喜欢以一种忙碌的形式来显示自己的人生态度,否则就会被当成消极遁世者,被当成矫情妄想狂,被当成神经病。若恰巧你一事无成,则不可避免地被人嘲笑。因为这样的原因,每当你偶尔听到心灵的召唤时,你就会故意装聋作哑,想方设法钻入人群之中。但是心灵若被蒙蔽,即使是假以理性思考之名将其遮掩,那人又何其为人呢?难道你非要跟动物比比脑体的大小才能证明你是人?

有人评说史铁生的这个文集时,说是在跟他的心灵对话,这在我看来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他的这些文章我先前在别的地方也读到过几次,现在再看,速度依然非常缓慢,因为你的眼睛盯在他的文章上的时候,总是念不了几句就走神。那么多精彩的文字,那么多丰富的构想,以及那么多连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也不能发现的逻辑,就是不能把你死死地盯在书上,几乎每一个段落都要让你联想到自己,最终你会明白,你不是他,你进入不到他的世界中去,你也不想费那个劲,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你所听到的,其实都是自己和自己的灵魂在对话。

这应该是你能够获得的最大的人生享受。

赚穷人的钱并帮助穷人

赵晓 = 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主,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

尽管舒氏提出的“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该被译作“穷人的经济学”还是译作“关于贫穷的经济学”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如何让大多数人分享财富,让大多数人享受现代生活水平,特别是让多数穷人的日子得到改善,的确是经济学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既涉及到增长,又涉及到分配、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伦理等许多内容。

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通常想到的办法是:一、改变国家的分配政策,甚至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使之有利于穷人。不幸的是,这种做法被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是成本巨大而收益微小的,通常的结果是大多数穷人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因为连绵的战乱而变得更加困苦;二、通过政府救济帮助穷人。这对于一个国家最穷和最弱的人来说确实必要,可以说,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存在政府对最穷者的救济制度,但这一制度却很难放宽至“更多的穷人”来享受;三、慈善机构、富人及企业出于爱心的捐赠和帮助。这也很重要,在某些国家,社会解决办法有时比政府救济更有效果,其最大好处在于改善富人和穷人的关系,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问题却在于,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在 40 多亿穷人的市场中发掘商机并根除穷困》
C.K.普拉哈拉德/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 月

这种帮助仍然有限,并且可能“冒犯穷人的尊严”,让其感觉自己缺乏自立能力而产生自卑心理。

有没有更好的帮助穷人的办法呢?

有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介绍了“在 40 多亿穷人的市场中发掘商机并根除贫困”。书的作者是著名的 C.K. 普拉哈拉德 (C.K.Prahalad),是“核心竞争力”一词的最早提出者。1990 年,普拉哈拉德和加里·哈默尔 (Gary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成为影响千万人的经典战略管理文献。而他的这本新书,在我看来,有很大可能会成为新的经典之作。

在一次漫长而孤独的旅行中,普拉哈拉德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正在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做着什么?为什么现有技术、管理知识和投资能力,仍不能为解决全球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创建更具有包容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显然,寻找一种解决方案,它属于经济学,与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不矛盾,却又能帮助世界经济中总数达 40 多亿人口的财富金字塔底层 (The bottom of pyramid,简称为 BOP)的人们摆脱贫困,应该成为普拉哈拉德这样同时熟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士的最优选择,也是最重要的方案。这样的选择和方案将摒弃“你是支持全球化还是反对全球化”这样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观,不再关心谁对谁错,甚至不关心在什么方面可能出现差错,而是关心“如何才能奏效”。

普拉哈拉德相信:整个创新性地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必须始于对 BOP 消费者的尊重。就合作的过程而言,作为穷人的消费者与私人部门之间是同等重要的合作方。贫困问题必须通过创新转化为所有人的机会,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市场。在普拉哈拉德的思路中,只有以良好的商业原则为基础的活动,才能使经理人保持热情和承担义务,延续活力、资源和创新。

普拉哈拉德就花费了许多时间去研究 BOP 市场,挖掘 BOP 市场的案例并进行总结。他发现,在开掘 BOP 市场上,人们习以为常的看法是“穷人不是我们的目标顾客,他们买不起我们的产品或服务”、“穷人没有

用过在发达国家销售的产品”、“对于跨国公司的生存而言,BOP 市场并不是关键因素”等。

但他的研究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略举六例:

第一,BOP 非常重要,它代表着重大机遇。按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在内的九个国家合在一起,其 GDP 达 12.5 万亿美元,比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诸国 GDP 的总和还要大。这样一个市场怎么可以忽视呢?

第二,已经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因挖掘 BOP 市场而受益,并使得穷人受益。如雅芳公司 (Avon) 是巴西最大的化妆品企业之一,它成功将 80 万名“雅芳女士 (Avon ladies)”培养成为分销商,甚至进入到亚马逊尼亚最偏远的地区。

第三,穷人同样有品牌意识,渴望消费国际品牌产品。事实上,只要采取一些办法,如将瓶装和大袋装的方式改成小袋包装,穷人就可能尝试性地消费“宝洁公司”的洗发水——哪怕他不能经常使用,却的确因自己使用了全球品牌的洗发水而感到兴奋和自尊。

第四,私营部门完全可以因为对 BOP 市场的介入和创新而获取垄断性回报。比如,尼加拉瓜农村地区没有现代电网体系,当地农民只能依赖于煤油、电池等昂贵的能源,特克诺苏 (Tecnosol) 公司推出了一种太阳能和风能的能源装置,使 BOP 消费者有了自己完全能承受得起的家庭能源。

第五,当穷人转变为消费者时,他们得到的比产品和服务本身更多,他们获得了尊严,也从私人部门那里得到选择,而在此之前,这些东西是为中产阶级和富人服务的。

第六,许多人以为跨国公司和 BOP 人群间难以建立起信任,并常常假设穷人的欠款率可能比富有的顾客高,事实却相反,穷人按时还贷,欠款率很低。

书中的精彩内容不止于上述六点。事实上,书中讲述了世界各国的许多私人企业开掘 BOP 市场,实现双方共赢的例证,所有读过的人都会印象深刻并且深受启发。

根除穷困的路有很多条,作为经济学家,我相信双赢、可持续性的 BOP 商业之路是最值得重视和珍惜的佳径。



C.K.普拉哈拉德 (C.K.Prahalad)

寻找一种解决方案,它属于经济学,与人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不矛盾,却又能帮助世界经济中总数达 40 多亿人口的财富金字塔底层的人们摆脱贫困,应该成为普拉哈拉德这样同时熟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士的最优选择,也是最重要的方案

BE COMING

愉悦的思考

傅勇 = 文

能用通俗文字与大众交流的“研究型”经济学家其实不多,这些研究型经济学家指的是处于学术前沿的那些人,而不是一般的评论家。

在张军教授的第四本随笔集《愉悦的思考》——前三本分别是《经济、社会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1998年第一版)、《走进经济学》(三联书店,北京,2001年第一版)以及《书里书外的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2002年第一版)——里,你会发现作者愉悦思考的轨迹!书中超过一半的标题都以“?”结束,比如,挑战中国汇率的是什么?中国企业为什么想到美国投资?为什么中国经济强大了,企业却没有强大?尽管金融失败了,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在增长?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抱着怎样的好奇。

“我想我的工作更多的是在试图对我所发现的现象给出解释。这些现象是用问题(question)来提出的……”

张军在书里说道。在封底,他说,“我写这些文章的过程是愉快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更是愉悦的。我庆幸我把思考当成了愉悦的事。既为愉悦,思考和写作就成了享乐。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可以坚持这样‘享受地工作’这么多年。”

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思考和写作,在读者中容易产生共鸣。当我们的好奇心被激发并得到满足时,其愉悦程度决不亚于作者自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仅给出机智的问题是不够的,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取得成功的另一半。

《愉悦的思考》收录了作者近两年来发表的各类随笔短评中精选出的60多篇短文,这些文章讨论的主题依次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宏观经济、企业改革、体制改革以及平时读书的心得或书评,最后是一篇《阅读张五常》。

在这本随笔集中,很多地方都可见到作者对研究范式的强调。很多是正面的呼吁,其中也不乏批判性的文



《愉悦的思考》

张军/著

中信出版社

2005年5月

字。其中两篇最为抢眼。一篇是应朋友之邀对其新作中一个理论所作的点评,文中作者对朋友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善意而直接的批评。同样的观点在他给《社会科学报》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指出“‘大批判’式的文章浪费了我们共同的注意力”。

经济学是一门按照模型进行思维的科学。阅读这本随笔时,我们更应透过轻松流畅的文字外表,探究字里行间隐藏着独特眼光和视角。对经济随笔作者来说,这是其能够进行愉悦思考并打动读者的秘诀,也是其能游走于学术和随笔之间的秘诀。

在《愉悦的思考》里,无论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近两年来炙手可热的宏观经济过热和汇率问题,抑或是像企业家的成长和创业精神等人文性话题,甚至是书评和序言,张军都能将其独特的眼光和视角呈现给读者。随笔既为愉悦思考的结果,阅读这些文字当然也就成了一种愉悦的体验。



三立漆
salle paint®

隆重招商!

2nd Generation
第二代
国家免检产品

新产品、新形象、新服务。三立漆第二代产品将以全新的面貌隆重登场,现三立漆北京分公司面向北京地区招商。

选择三立漆的七大理由:

1. 涂料行业首批国家四大免检产品之一,给您足够的信心保证;
2. 大、中、小型专卖店,公司为您量身定作,让您轻松创业;
3. 营销、策划、技术培训一步到位,尽显专业水准;
4. 完美的专卖店加盟程序,与您共赢的经营理念,更大化保障经销商利益;
5. 特有的专卖店形象,更显三立漆独特个性;
6. 专业化的管理,最大化的利润空间,让加盟者无忧投入,放心赚钱;
7. 前十名加盟商,免代理费。

诚邀新一代具有品牌营销战略智慧的伙伴垂询:区域代理,地区分销商等相关事宜!

泉州市三立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天通东苑三区58号楼6门

招商热线:010-61747100 61765380/81

传真:010-61747568

网址:www.salle.com.cn



中国轻工联合会



中国轻工联合会



中国轻工联合会



中国轻工联合会



中国轻工联合会



中国轻工联合会

杜庆春=文

一个蛇头将几个失踪了的中国偷渡客举报为潜入恐怖分子,这是几个月前在美国发生的新闻。当美国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照片,这几个偷渡客的表情表明,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在非法穿越美国边界的同时,也穿越了越界打击合法化后的虚构边界。他们成为恐怖分子,成为全球政治系统里被虚构出的“他者”——流氓地带的恐怖分子。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称这个世界是“流动而临时结合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新原则冲击着建立在“民族-国家”概念上的“完全主权”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它自身命运的反复无常。

社会学的边界

在《被围困的社会》里,鲍曼讨论了建立在“社会工程”的社会学的自我革命,从而探讨了“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的关联,以及在后现代社会或者说流动的现 代性社会 中,在后 9·11 时代的全球政治背景下,“民族-国家”概念的困境。一方面,全球化让世界成为没有“外部”的整体;另一方面,跨界打击和现代性改造滞后的地域,依旧将自己的要求诉诸“民族-国家”概念,前者虚构所谓“邪恶轴心”,后者依然处于国家权利和民族生存权的蜜月期。

鲍曼给出了社会科学和现代性的明确联系,同时也将“现代性的问题和新旧制度的轮替”这个社会议题做了紧密联系。鲍曼说:“现代性是对旧制度逐渐的、但持续的和令人震惊的瓦解的一种反应。”在这个层面上,西方世界的现代性有三个有趣的爆发点——文艺复兴将人文精神带入,让思想有了现代性的起跳点;英国工业革命则提供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生产关系;法国大革命则在“社会-政治”制度层面上提供了现代性的圣经。

在引言的开始,鲍曼下了这样的断语:“社会学是作为一项现代计划而诞生的。像所有其他现代计划一样,在诞生后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历史中,它接受了孔德三位一体的任务:预测源于科学,行动源于预测。”他指明,“社会学的历史大致上同现代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竹岛或独岛

最近,日韩之间关于竹(独)岛之争,呈现出东亚现代性进程中的困境。鲍曼所谓:“在现代性的稳固阶段,合法性争论的最终结果似乎已成定局。只有一个竞争有可能在现实中获胜,这就是联合起来的新兴民族和新兴国家。民族合法化了国家对纪律的要求,而国家则支持民族整合/同化/镇压的



齐格蒙特·鲍曼

越界之旅

野心。”“‘主权’和‘民族-国家’是同义的。”

日本和韩国在内心深处依旧将自己视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一个真正的“国-族”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不仅如同鲍曼所言:“民族忠诚和团结是一窝蜂式地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大规模拷贝的个体行为”,而且个体彻底被“国-族”的想象共同体完全取代。日韩的这种对立,是整个东亚的社会现实,全球化的背景使这个世界没有“外部”,欧洲一体化进程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困境,而东亚则很可能是一个无整体未来的个体格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有《想像的社群》,1983 年)创造了“想像的共同体”这一概念,鲍曼略带调侃地称这个概念的诞生依旧遵循了密涅瓦夜鹰的习性,依旧在概念的描写对象已进入黄昏时才诞生。而在当今社会中,“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反对国家,反对它的地域性,反对它对主权完整的要求,反对它划分并加强边界以及阻止或打击跨越边界的内在倾向。”

而在东亚的社会现实中,密涅瓦



在中国大地上关于边界的再度确立和关于边界的记忆,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显著特征。不仅是围墙内的民工,还有庞大的群体都陷入“乡关何处”的集体乡愁中。这个现象是鲍曼无法深入讨论的,他注意到边界的消失,而没有注意到边界的痕迹,没有注意到对边界需求的心理惯性。关于边界的记忆成为自我身份确认和认同的关键方式,成为将漂泊的个体重新回到温暖集体的关键路径

夜鹰肯定在炙热的正午就飞了出来,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对“民族-国家”正做着热情的“白日梦”,梦的背景依旧是美国为主轴的全球战略布局,如果竹(独)岛引起两国擦枪走火,美国在两地的驻军就成为最尴尬的旁观者,这是在美国虚构的边界的内部冲突。“民族-国家”观念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词语的内部缺陷,和东亚文明自身的文化基因缺陷,在这个地区呈现出自燃现象和冷战式对立思维模式的双重后遗症。

“有床”或者城市准入制度

北京的胡同里有一些小旅馆,经常在门口挂上纸牌,上面写两个字“有床”。

“有床”意味着“客没满”,看起来“有床”和“客满”是一对相反的概念,但内涵却是一样,因为这个概念是指向外部的。鲍曼说,“拥挤的世界”并不属于“客满”的情况,原因很简单,因为并没有所谓的“外部”,没有其他藏身之地,也没有世外桃源。而“有床”的旅馆是提供给外来者的一个暂住的许可,是内部者给予外部者关爱的方式,更是内部者获利的特权。在这座城市拥有“床位”是外来者的梦想,北京周边庞大的“睡城”一样的社区,基本上成为新一代城市移民的共同体。

当年上海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流行语,更是将“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看成特权,这是一种前现代的特权。与此相反,在流动的现 代性社会 中,“既然在全球相互依赖的制度下,有效行动及其获得满意的行动结果的机会是变化无常的,所以,流动就变成了最珍贵的和最受欢迎的资源。”

身为北京某大学教授的一位民意代表,要求强化北京市的准入门槛,她

POLITICS

巨人的难题

大卫·伊格内休斯 = 文
张一帆 = 译

正当美国在为战后重建伊拉克遇到了一堆难题的时候,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出版的新书里写到,美国需要一个现代版的英帝国殖民地事务部以确保境外势力范围内的政治稳定。弗格森在这本叫做《巨人》(Colossus)的书中写到,美国军队在摧毁上有一手,可是在收拾烂摊子上就不那么有经验了。

我们在布什政府里找不到任何会支持弗格森所提出的这种新帝国主义言辞的人。但是,在表象后面,当局正在筹划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转变要把美国推向这个方向:美国的军队、外交部和其它部门会面临改革,使其能够更好地处理类似在伊拉克面临的困境。虽然不会有任何部门改名叫做“殖民地事务部”,但是从许多角度来看,这个前英帝国的机构正是不少官员在讨论控制远方不稳定因素时的参考模型。

像华盛顿许多其它的事务一样,伊拉克战后政策变化后面的推动者是政府的“劲量电池兔子”——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这些新政策出台前的讨论大多也在幕后进行,只有一个小圈子内的国防和外交专家参与,可是他们讨论的问题对美国的前途影响深远。我这里写的是依据网上可以读到的一个公开报告整理的预告。

在所有分析中,最有创造力的要数拉氏要求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起草的一份报告。这个精英组织去年12月发表了《战争过渡的前与后》(Transition to and from Hostilities),它为美国政府如何获得在伊拉克的国家重建能力

提供了一份蓝图。

这份五角大楼的报告一开始就指出阿富汗和伊拉克并不是个别问题。它还指出,自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每18到24个月就会开始一个保持稳定、然后重建政体的行动。这些行动并不是短暂的冲锋;事实上,每个行动都用了5至8年这么长。其中的问题在于,参与这些漫长重建计划的美国军队,本身接受的训练是针对快速、彻底的歼灭行动的,这种不协调的做法,是美国在伊拉克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之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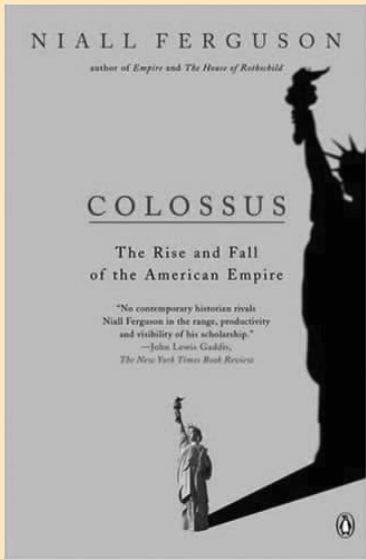
国防科学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美军要把自身在作战上的调度与运筹用到维和的管理上。该研究还敦促政府,筹划出一个意外计划措施,用来找出必须要美国干预的国家和地区,并且保证军队有相应的语言能力、地方情报以及处理民事问题的优势。不难看出,这些东西正是美军2003年3月赶到巴格达去时所缺乏的。例如报告正中要害地指出,在2004年,国防部具有法语能力的员工有6723人,俄语4194人,而阿拉伯语仅有2864人。

报告中的另一个建议一定会使军队中习惯常规作战任务的将军们头痛。报告强调说:“保持稳定和重建任务,必须成为国防部和外交部都必备的核心能力。军方必须重新组织它们的队伍,从而能提供保持稳定和重建的能力。”

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跟从了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国防研究专家托马斯·巴尔耐特(Thomas P.M. Barnett)写作中提出的观点。他在去年发表的《五角大楼的新蓝图》(The Pentagon's New Map)一书中提出军队应该被分成两个分支,反映出不同的需求。空军和海军组成一个“利维坦”队伍,用来提供全球范围内快速的震慑力量;另外一个主要有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所谓“系统

行政”队伍,用来对付冲突结束后保持稳定和重建一个国家的挑战。

这些伊拉克战后出现的革新思想,渐渐开始根深蒂固。美国国防部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重建于保持稳定的调度办公室”。虽然现在这个部门只有40个人,但它已经开始协调五角大楼、外交部、中情局和国际开



发署的行动,从而避免重复伊拉克重建刚开始时出现的混乱。同时,共和党参议院理查德·鲁格(Richard Lugar)和民主党参议院约斯夫·比登(Joseph Biden)也一起提交了一份会将许多国防科学委员会报告中的提议变成法律的草案。

弗格森在《巨人》中问到,美国有没有在21世纪建立一个帝国架构的才能、耐心和财力,这仍然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要把军队改造成一个公众并不了解和支撑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做法。美国能从伊拉克的失误中学到什么?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对的。但是我想,现在整个美国必须加入到这场辩论中来。

的提议遭到抨击。之后不久,北京市正式宣布取消一些外来人员的行政性管理。此次,行政改革意味着流动权被看成公民权的一部分,公民被视为一个内部均质化的没有“外部”的整体。

进一步沿着鲍曼的思路思考中国都市化问题,依然要认同他对“流动依旧是稀缺资源”的判断。鲍曼根据交通和通讯工具使用率统计来判断,西欧、南欧和北美居民依旧拥有特权。而更让我们关心的是中国农民进入城市后的再度固定化现状,那些生活和工作在工地上的民工,和流动的城市生活很少有关联,工地围墙再次成为边界,流动依然稀缺。那些居住在工地临时建筑中的民工,他们的现实是以围墙为边界的城市中的暂住村落,而情感上关于边界的想象依旧是乡村与城市的区隔。

恰恰相反,这双重边界在流动性社会中应该被高速公路、铁路这些高速工具迅速擦除的。正如法国著名建筑学家、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所言:“新的空间是速度-空间,而不再是时间-空间。”“这种新情形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是,所有边界都是可以穿过的。因此,所有划出的边界在本质上都是无效的,至少是临时的和可更改的……边界在被划出的同时就被擦掉了,留下的只是曾经划过边界的记忆。”

那么,在中国大地上关于边界的再度确立和关于边界的记忆,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显著特征。不仅是围墙内的民工,还有庞大的群体,都陷入“乡关何处”的集体乡愁中。这个现象是鲍曼无法深入讨论的,他注意到边界的消失,而没有注意到边界的痕迹,没有注意到对边界需求的心理惯性。关于边界的记忆成为自我身份确认和认同的关键方式,成为将漂泊的个体重新回到温暖集体的关键路径。



《被围困的社会》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
邹建立/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2月

在新城市移民中,“生于1970年代”之类的时间性表述,逐步取代空间性的“老乡观念”,历史性的共同记忆成为“时间性的乡愁”,这种倾向强化了对“时间性土特产”的需求,某个时代的生活独特的表象化成为消费的对象,这点在电影《孔雀》中被强烈地呈现出来,这部电影也表明,鲍曼所谓“空间时代”的“家”是一个有严密边界的地方的判断,完全可以延续到现代中国,“时间性乡愁”成为另一种“长城”,后者正是鲍曼所谓的“空间时代”的起源标志。

在误解中前行

叶檀 = 文

在 当今中国学术界,误解与争论互为前提。争论的时间一长,目的反而变得不甚了然起来。

有时,争论各方是为了诸如“人文精神”、“五四精神”之类的宏大话题,有时为了一个学术枝节问题,有时纯粹出于意气。争论各方身份也变幻莫测,有原先就分属不同阵营的,也有原先属于同一阵营、因为某个观点不同反目成仇的,也有虽属同一阵营却各唱各调的,也有不同阵营却因宽容而坐在一起进行学术辩论的……于是,大多时候,学术界不得不令人痛心地为辩论的场所。

这中间,当然有阐释学意义上的文本重构所出现的理解偏差,也有学术观点不同产生的歧义,也不乏有人

纯粹为证明本派的“主义”正确,或是个人见解的高明,对对方观点进行有意曲解,这只能被视为学术亵渎行为。比如,最近有一个学者将“可厌的德国古典哲学腔”大骂一通,认为王元化、李泽厚等人的作品成了“害人的东西”。文章激情洋溢,却全无逻辑推理过程。

此等辛辣速食的文风会败坏了读者的口味,平和中正的严谨之作变得不再有趣,人们不惮用最尖刻的词,以求在信息爆炸时代留下一个高而尖的回响。浮躁时代盛行的工具理性,带来另一个更恶劣的后果是,在无尽争论与争论的戏剧化过程中,只要能证明自身的存在,误解本身成为目的,给任何一篇文章贴上主义的标签,思考的过程便告完成,自由与民主亟需的宽容荡然无存。

似乎敏感到风习变迁,也为澄清

时贤的误会,王元化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近作《清园近思录》。作者认为,学术思想的价值存在于学术思想本身之中,反对学术依附于某种力量,或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这不仅指学术不应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也泛指学术不应为任何一种“主义”所胁持,沦为思想的工具,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时下风行的那些“主义”。

虽然并非有意占风气之先,这一主张在当时却恰好汇聚成学术界一股主流意识,与“国学热”竞相辉映。在学术独立性、知识分子独立性已成共识的今天,这一观点出乎意料地给作者带来严重困扰:不少学人以为王元化先生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反驳,是意有所图的绥靖政策。

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误会,从根

读者通过订报卡可获得



现在购买订报卡还将赠送:

- 两周年合订本光盘 (价值76元)
- 3个月下载使用金融界“中国股市X档案”服务
- 3个月网易188财富邮服务 (www.188.com)

订报卡目前已开通 北京/上海/广州 等15个城市。其他地区正在开发中,敬请关注!

EEO.COM.CN 经济观察报 **订报卡**



详情登陆 **www.eeo.com.cn**
咨询电话 **010-64297521**

本上说，这一提法是这位经历多年“文艺为 XX 服务”、“学术为 XX 服务”的思想家，经过长年沉潜反思的必然结果。确实，宽容容易被误解为中庸，更糟糕的是，会被误解为对现实的妥协。

但这位金刚怒目的老人的个性实在是不善于妥协的，或者说，是带有过度理想化色彩的。以王元化先生现在的地位，大可高高在上，以表面的长者宽厚换取更大范围热诚的崇拜。但他不然。见过他的人都会对他表达观点时的“壮怀激烈”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一些学界人物与社会恶习的批评，就像他对自己思想的剖析一样，极为苛刻。在许多人用“历史原因”四字，进行轻薄的反思时，作者对于自己的行为的反思锥心刺骨。为了当年批判胡风的一篇文章，至今愧疚不已，一再形之于笔墨。虽然他在当时的表现可用“耿直”二字形容，因为不肯附和胡风是反革命的结论，遭到关押，被打成反革命，精神几近崩溃。

像岩石一样坚硬的性格，成就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反省精神。自由精神是需要独立的行为作为支撑的，世故的行为方式，注定从前门迎进自由的概念，而从后门出卖自由的精髓。由于自由的思想由生命体验而来，并且经由世事的磨炼与验证，更不易改变。王元化先生常笑称自己是湖北人“九头鸟”，荆楚之地的刚烈遗风给他打上了烙印，脾气怕不容易改。老友钱谷融评价王元化，“既英锐而沉潜，既激烈而又雍容”，他确实把对历史的宽容，与对学术的苛刻，奇妙地结合于一身。

因为身体与年龄的关系，现在王元化先生通常在家接待四方鸿儒与晚辈学人。屋里陈设简单，几把圈椅、几杯清茶便是待客之道。在从古希腊哲学到当前中国社会存在问题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谈话中，最活跃的就是这位长者。他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拿出手绢，不停擦头上身上的汗，为药物反应不得已的失仪向客人道歉。确实，他已经极少出门，因为严重的眼疾，使他艰于阅读与创作。

《清园近作集》在这样暮年困顿的状态下，断断续续产生了，书中收录的近年书信屡屡流露，“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的慨叹。在许多文章的末尾，我们常常可以见到某某“代为笔录”的字样。

本书思想与行文的严谨如作者为人，逻辑缜密到无懈可击。这增加了创作的难度，口述的作品，虽由信

任的人笔录，也往复数次校对，到最后弄得双方神疲身倦。加之作品涉及范围庞大，从古代文史、五四精神反思、卢梭“公意”与黑格尔“小逻辑”，到现代西方哲学、往事遮拾，近事记载……可以想像，不管对口述者，还是记录者，工作都是一个苦差事。当然，有时也应该成为一件至为快乐的事。

在王元化先生的著述与谈话中，时常以宽容的心提及往事，也以宽容之心对待既有的思想与历史人物。他曾表示，年轻时那种单纯的激进，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身处那样的环境而不激进，简直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作者显然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学术的独立与思想的宽容，对于一切主义，都带有根本价值，宽容的缺失导致极端理念盛行。但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事，在一个人人认为“真理在握”的氛围里，提倡宽容有序会被贬斥为“腐朽”、“丧失思想的活力”。

在书中，作者重提对五四的评价，并以杜亚泉个案研究证明，正是不宽容与误解导致今天中国文化范式缺失，重建乏力。作为五四后期的知识分子，作为从激进思想中涅槃的知识分子，王元化先生对五四传统与五四所批判的传统文化全都保持同情的理解与清醒的批判。因此，他既不会全盘接受激进的五四，也不会全盘接受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

这样的角色是尴尬的，也不易获得各方理解。他的宽容被激进者认为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叛，发出连篇累牍的讨伐檄文；而“告别革命”论者，同样无法原谅他对“告别革命”的批驳，认为他已经绕回到年轻时激进的老路上去。因为误解，以及“误解的误解”，一些曾经的同道，一些曾经奉他为思想解放先驱的人，对他不原谅、不理解。而这又被王元化先生视作意图伦理的



《清园近思录》

王元化/著

文汇出版社

2004 年 8 月



王元化

明证，斥责为激进的工具理性劣根性的发作。

如果我们不抱成见，细读王元化先生对五四缺陷的批判——意思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以及对“五四”主要成就的肯定——当时掀起的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使人们认识到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从而在思想上、精神上开始树立起独立自主的观念——无法否认，这样的反思是严肃认真的，也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五四后粗糙激进的工具理性、对异议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尖刻，以及对个人自由的重视，造就了今天的文化奇观。对历史以及历史经历者的不同情不宽容，使思想被意气之争所伤，扭曲为学术暴力。

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典型地体现在对杜亚泉的研究中。杜亚泉曾是“五四”时期重要的科学启蒙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不仅不遗余力地编译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第一个创办了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个翻译了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率，许多化学元素命名沿用至今；在入主商务印书馆 28 年间，还编译了大量中小学自然科学教科书，主编了大量词典，如《动物学大词典》、《植物学大词典》、《矿物学大词典》等。这种从头开始的工作，虽然不如登高一呼容易引发轰动效应，不能收即时之功，却有长久之效。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不应被贴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弃如敝屣。

王元化先生认真披检杜亚泉的文集，认定这是一个稳健的渐进式的自由主义者，这种稳健的品性是中国近代史的学人中罕有的，只在胡适等少数几个人身上闪耀过光辉。

不幸的是，五四一辈学人对杜亚

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误解，如今在杜亚泉的辩诬者身上重演。由于多次深陷被误解的尴尬境地，王元化先生在前言中，借友人林同奇的话感慨：“熟悉学术界争论的人都很容易发现，争论双方往往得花很多口舌，来澄清对方对自己的误解。”

实际上，在王元化先生的学术个案研究，与细致的考据学中，是藏有“野心”的，那就是，“无论是谈人文建设，还是历史人物考订，还是谈京剧，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而是出于建设中国文化的努力”。这又与杜亚泉以中国传统文化，渐进式地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建立中国独特文化范式的理想相同。这一行为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罗马文化的细致考证，由此竟曲径通幽，认识到个人的自由、尊严与价值的不可侵犯。事实上，这一传统在中国也不绝如缕，清代的乾嘉学派进行的字义考证，其背后的深义也正在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对学术压制的反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而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最纯粹的代表，胡适后期详订《水经注》，赞成“动手动脚找材料”，绝不会是无的放矢的一时心血来潮。

作为古代文化的研究大家，王元化先生对于学术独立的倡导，是否有“上继传统学术，下开自由宽容之门”的目的呢？是否是建立中国文化发展范式的努力呢？

不过，对于建立值得推崇的、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发展范式，作者并不抱乐观态度，他认为自己只是个“过渡时代的人物”，显然，这一评价并不是专对作者自己的，也是针对这个转折时代的。这一时代，不仅五四激进未除，又迎来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狂潮。所以，作者深为赞成本杰明·史华慈教授提出的“当今千禧年主义”。如何阻止美国的片面现代化，顺理成章地组合到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中，中国人文精神中的积极因素，成为作者拿来对抗意图伦理与物质主义的武器。

也许有感于改变的艰难，本书开篇访谈中，王元化先生一上来就认同自己在精神气质上更倾向于五四前一辈人，因为这一辈人“想的是如何昌明旧学，融化新知。想的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五四以后就不是那样了”。杜亚泉显然就是这样的人，而现在，王元化先生显然想在这条糅合中西文化，建立中国文化的发展范式的路上继续走下去。随着他年纪增大、对事理的理解与对远景的观瞻，这种独立越发显得坚韧。



埃利亚·卡内蒂

历史的表达

威廉·菲利普 = 文
张艾 = 译

欧洲迟早会打破美国对于炮制新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垄断。二战以来,社会问题研究成为美国的一大产业。社会学家们当仁不让地成为该产业最大的生产商,此外,还有少数历史学家、一些老于世故的大牌记者和几位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出现的思想家,也为美国的这项国家事业做出贡献。

这其中肯定有一些力作出现,但大多数所谓的新研究不过是关于美国社会的发展报告。这些人声称自己的研究是以实践经验为根据并广泛接受各方意见的,可实际上无非是创造一种新的观察方式,以使其理论和个人见解看似事实。有些研究以对文化的新形式的系统辩护取代系统分

析;另一些似乎持更具批评性的态度,并且往往对文化所具有的圆滑性颇有微词。问题是,这些批评本身就是圆滑世故的,以致一经提出便迅速风靡。诸如此类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造成的结果是:评论的对象与评论本身被混为一谈,随即共同成为同一文化论题的组成部分。

《群众与权力》是一本来自美国之外的新作,综合了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并且已被权威人士认定为见解独到、意义深远和富于想象力,正是我们一直盼望出现的力作。据说,作者运用高度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从全新的视角展现了文明的面貌。关于本书的评论尽是溢美之词,而且大多出自名人之口,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韦奇伍德(C.V. Wedgewood)、享誉欧洲的英国诗人凯瑟琳·雷尼(Kathleen

Raine)和杰出的英国女作家艾莉丝·默多克(Iris Murdoch)。众口一词的赞美,简直让人不能不心生疑窦。试想,一本像《群众与权力》这样的新书问世不久就得到“新《金枝》”、“二十世纪的《利维坦》”等美誉,其作者卡内蒂也被视为“六十年代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而现实中,有多少伟大的作品在诞生时是那样不引人注目,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方能获得广泛一致的认可。

尽管《群众与权力》一书被宣传为引领思想者走向现实的指南,想说清它的主题究竟是关于什么的还很困难。卡内蒂在书中似乎主要想说明,历史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种要素:社会,即“群众”的较为复杂的存在方式;权力,产生自“群众”的需求与其统治者的需求相一致的事实。

这样,根据卡内蒂的观点,人有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分。这在今天并不是什么令人惊愕的想法,最多不过是一种领悟,而且并不新鲜。因为,多数关于现代社会的研究都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涉及领袖或统治者对大众的操纵。此类研究的价值取决于研究者如何对其进行论证和深化。

但是卡内蒂并没有进行真正深入的阐释,而是用说明、联想和类推编织了一张网。这样,他写成了一首诗。问题在于,这不是一首好诗——冗长而杂乱,充斥自造的术语,过于自以为是。其主要手法是将不言而喻的道理转换成各种隐喻,把客观现实表述为新的发现,如“岗位上的士兵只依命令行事”,战争就是一个人群与另一个人群的打斗,“革命时期一切都速战速决”等等。然后,将各类可能相关的历史事件附会其上。很多比喻本身就是蹩脚的,其中最标新立异的是卡内蒂将人群比喻为精子,只有一个能最终

存活。还有些比喻是纯字面上的,比如说到在通货膨胀中,“货币单位失去其特有的身份”。

这一切都与好诗应有的特点背道而驰:缺乏对事物新颖而具体实在的联想,难以使人产生眼前一亮或焕然一新之感。书中不过是以“诗意”的语言描述平常的观察,并刻意让它显得更具启发性。另外,与好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不同,卡内蒂一些有感而发的花哨语言好像很容易变换一种措辞进行解释。

本书的结构非常简单。开头部分罗列各类人群及其特征。由此,读者了解到人群基于“同等性”而形成,“乐于保持紧密的关系”,“希望不断壮大”并“需要进行引领”。这些人群或十分合拍或死气沉沉。接着,读者会发现,这些人群中包括找碴儿人群、逃跑人群、禁止人群、逆转人群、欢宴人群、恐慌人群、两面人群、无形人群等等。(没有孤独人群!)

之后,卡内蒂回顾部落文化以考察他所谓的“帮”,也就是人群更为基本的构成。随即又运用“群众象征”这一术语以人群的概念解释最新社会现象,如希特勒权力的扩大、议会制、通货膨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可笑的部分,因为卡内蒂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视为受工业生产理念困扰的社会,仿佛工业生产是一种疾病。在卡内蒂的理论体系中,工业生产完全是“现代社会暂时的疯狂增长”。由于“增长”也是人群的一个特点,工业生产正好成为人群日趋疯狂的一个例证,因为商品和消费者也分别构成集群。

最后,卡内蒂探究了权力的问题。他对各种文明中围绕统治者形成的带有心理暗示性的传说,进行了具有独创性的思考,并就此做了长篇的说明。最终,读者的脑海里出现一个患有偏执狂的暴君形象,“对于生存的强烈渴望”促使他摧毁令他可能生存下去的一切。

本书以一段热情洋溢的结语作为结束,读上去好像时下流行思潮的大功率版本。卡内蒂在其中警告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危险时期:“幸存者自己感到害怕”,“统治者在发抖”,“因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如今,要么人人都活下去,要么一个也不剩。”

在《群众与权力》一书中,也有一些精辟的议论出现,比如卡内蒂指出,剧院中一场大火所形成的凝聚力,有时比演出的剧目更强大。不过,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读起来都像是对历史进行的心理分析。以这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其成果实在不会比对一个人进行最基本的逻辑分析得到的更多。



《群众与权力》
埃利亚·卡内蒂/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1月

明茨伯格的挑战

肖知兴=文

商学院里一般是不大谈哲学的,我在 INSEAD 的一位好友却是后现代思想的爱好者,从福柯到德里达,从利奥塔德到布尔迪厄,他都爱不释手,经常和我念叨。他几乎从来不上电影院,但却非常迷恋 **Matrix** (国内译为《黑客帝国》)一片,因为影片的灵感和基本构想来自法国后现代思想家波德里亚,特别是其《仿真和拟像》一书。细心的 **Matrix** 迷们可能都知道影片刚开始时的一个细节:尼奥手中拿的那本书就是《仿真和拟像》。“影像不再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虚拟的实在。”(波德里亚语)洁白的桌布,璀璨的餐具,流淌着汤汁的那块牛肉到底是不是牛肉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看起来像牛肉,闻起来像牛肉,吃起来像牛肉。

有一次,在枫丹白露的森林中散步时,我们聊起战略研究的两大学派(以波特为首的内容派和以明茨伯格为首的过程派)之间的关系。忽然,我们几乎同时回过味来:内容派那种对商业过程的格式化、程序化、理性化的处理方式,以及通过依靠这种处理方式在工商界获得的话语权和政治经济权力的过程,不正是波德里亚和 **Matrix** 中所说的影像和虚拟代替了现实,成为人们消费和膜拜的对象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以波特的最著名的五力模型为例。行业的利润率决定于供应商、客户、替代品、竞争对手和潜在竞争对手五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乍看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真实世界的企业家真能靠这个分析模型来制定成功的战略吗?历史上哪个成功的企业是因为熟练地使用了这个分析模型而获得成功的?就拿上次波特在《对话》节目中所举的戴尔的例子来说,戴尔的商业模式是戴尔在学生宿舍里给人家组装电脑时想到的,如果他是波特的学生,五力模型用得再好,恐怕他也是做梦也想不到直销定制的电脑的概念将会在世界电脑业掀起一场革命性的风暴。

所以,类似这样的分析框架,很大程度上只是对真实世界成功战略的一种事后的合理化解释(所谓事后诸葛亮),而不是战略过程中的切实可用的指导工具。它适合于在有了优秀的商



业模型之后进行锦上添花式的确认和追认,却无法代替当初综合经验、灵感和偶然性发现与建立这个商业模型的过程;它也许可以用来否定不成功的商业模型(从而决定不对之进行投入),却很难用来肯定一种商业模型(从而决定对之进行投入)。但是,这些局限性并不妨碍类似这种分析模型本身简洁优美的逻辑感使得它脱离真实世界而获得一种独立的符号价值,为使用它的人提供了合理性。也就是说,它是不是真正合理和理性的(rational)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看起来合理和理性,能不能为使用者提供说辞和理由(rationale)。

在新制度主义社会学里,一种工具的形式脱离其内容和原始目的而获得的独立存在价值的这种现象被叫做“松散挂钩”(loosely coupling)。作为一种形式,它没有理性价值,不能增加运营效率,但却能提供另外一种价值:合法性(legitimacy),其目的在于在同行或客户眼里制造出一种规范、专业、先进的形象,从而为使用者带来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利益。

管理领域的各种时髦词汇、最新技术很多都可以归入此类。这些经不起细究的时髦大力流行的根本原因是,它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能为它们的使用者带来的强大话语权和政治经济权力。在公司内,对于底层,体现为同事和领导的赏识(从而带来提拔和提薪的机会);对于高层,体现为整个公司对自己的战略的服膺和支持(从

而带来执行的力度)。在市场上,体现为战略咨询公司以百万计的战略咨询合同。时髦技术发明者更是变成了一尊尊的神,合理性之神,可以插上标签卖个大价钱的神。

而明茨伯格是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地专干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人。从一开始抨击的管理的五功能论,到战略计划论,再到现在的 **MBA** 教育体系,他面对的都是一架架在隆隆巨声中运转的庞大机器。有人说他是与风车决斗的堂吉柯德,有人说他是大叫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天真孩子,有人说他是赤手空拳的独入虎穴的英雄。不管是什么,他肯定不是 **Matrix** 那些甘当电池,任由机器控制思想的末世人类中的一员。

商学院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金钱挂帅的地方(哈佛商学院硕士帽就缀用美元装饰),在这里跟商人和准商人们谈哲学,谈《仿真和拟像》,是很冒险的事情:一方面商人可能不愿看,另一方面哲学家又可能不屑看。但因为想介绍明茨伯格的观点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明茨伯格本人也许不是一个好商人(至少比波特教授差得远),但是他的貌似离经叛道的言说背后,洋溢的却是对真正的商业精神和商业品格的尊崇。他也许不怎么讲利润、讲绩效,但正因为无数像他那样对商业之本——人的首创精神和合作精神的大力呵护的人,西方的商业之花才得以绽开数百年如一日,历久弥新。

BUSINESS



《管理者而非 **MBA**》
明茨伯格/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年 5 月

康力 = 文

《中国式继承》

刘建强、边杰/著

中信出版社, 2005 年 5 月

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正逐渐步入财富继承与企业交接班的高峰,近年来发生的企业家突然去世事件如王均瑶、陈逸飞的突然去世都凸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在《中国式继承》中,刘建强、边杰两位作者总结中国的财富继承与企业交接班的特点首先是“双重继承”,也就是企业的管理权与所有权同时转移。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与交接班问题:其目的是保证财富的代际传承,而其关键是保证企业管理权转移到合适的人手中,因为这里涉及财富主要是企业股权的形式。以这个视角,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企业继承问题: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选择家族成员是因为外人无法保证财富传承;家族代际财富继承过程中的种种波折,往往只是管理权交接出了问题,而那关乎人性——没有多少领导者愿意早早放弃控制权;对管理权的交接而言,最重要的要素是时间,因为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而两代人之间的交接需要在合适的时机完成。

在中国的状况下,把管理权转给外人无法保证财富的传承。兰州黄河集团是常被提起的反例,职业经理人王雁元转移公司资产,甚至另立董事会,险些将公司创始人逐出公司。重庆力帆集团尹明善是家族企业的支持者,他特别反感一些经理人“微软的出去以后骂微软,创维的出去骂创维”。在选人上他的做法是“贤亲并举”:为了稳定任人唯亲,为了发展而任人唯贤。在现今中国的状况下,把管理权同时转移给下一代是必然的选择。

但是,在商业史上家族管理的企业接班不成功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的原因在于人性,老一辈不愿意放弃公司的控制权。比如亨利·福特和它的儿子埃塞尔。每次埃塞尔对公司经营方式提出改变的建

议,他的父亲总是否决他。有人暗示正是福特的顽固不化导致了他儿子身患胃癌。在埃塞尔的葬礼上,他的遗孀冲上前去对老福特说:“是你杀死了我丈夫。”



中国式继承

在《中国式继承》中,两位作者描述了多个成功的故事,阅读的时候甚至要让人产生错觉——中国家族企业继承似乎有着一种成功的禅让模式。只有如下这个数字才能打破这种错觉,2003 年所作的一次调查显示,对“你是否已对自己在公司中的股权继承问题预作安排”这个问题,所有参与调查的企业负责人的回答都是“否”。在这个必然到来、非常明确的问题上,他们都未作安排,他们早早指定管理上的继承人的比率也不会太高。这样一个漫画深刻地描绘老人们不愿放弃自己的控制权的状况:一群老头凑在一起,一个人说,“强制退休的时间已经改变,大家都赞成延长至 95 岁。”

如果只是在谈外部因素,而没有考虑到即将离开的领导者的心理与情感,我们就没有涉及交接班的核心。那些创下基业的人要从最高的权力高峰上走下来,远离众人瞩目的中心,这会迫使他们思考一些关于永恒人性的话题:如何看待权力,如何看待身份。在书中作者引述瑞士 IMD 商学院乔基姆·施瓦斯教授的话说,

“他们(第一代家族管理者)不愿意放弃控制权,对如何培养下一代的认识也不够充分,结果导致第二代‘通常感到心灰意懒,经常厌恶工作,而且对继承家族生意准备不足。”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最近连续发生的企业家突然去世事件也许可以迫使他们自问这个艰难的问题:当你过马路不幸被车撞了,你是否有一个适当的继任者?只有这个问题才能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最根本的目标不是控制权,而是把财富传承下去,因而必须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有效地进行管理权交接班的工作。

而培养一个接班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按照一个研究的说法,从公司内部培养一个 CEO 继任者至少需要十年。因为我们已经假设,在现阶段中国家族企业继承上,管理权只能传递给家族成员,因而必须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们。在中国家族企业的成功交接案例中,如江浙地区的红豆、方太和万向,创始人都对第二代进行了长达 7、8 年的培养,从而成功完成管理权与所有权的交接。

财富梦想

何志毛=文

《首富:福布斯 21 国第一富人的深度解读》

吴晓波/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

把历史的时针往后倒拨 10 年,虽然《福布斯》的富豪榜还不曾垂青中国大陆,但“中国首富”无疑却是那个年份最有创造力和蛊惑力的概念。那个被命名为“中国首富”的家伙,有一个古怪的名字“牟其中”,却磁铁一样牢牢吸附着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他当时正陷入人生的最大困厄,因为不想逼着学生补课背书,他被校领导强烈憎恶、以致在教鞭和粉笔的队伍中彻底边缘化了,但他看完牟其中的传记的那个夜晚,斜靠在床铺上,向我描述牟其中的传奇经历时,我至今不能忘记:他的表情有着发烧一般的亢奋和自我迷恋。几年后,他离开学校,什么也没要,去了日本东京,不消说,财富梦一直鼓舞着他匍匐前进。

那么,把历史的时针往回倒拨 20 年,又是什么情景?北京的柳传志正和他的科学家创业伙伴们汗流浹背地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一些电子产品;广东的一些洗脚上岸的农民夜以继日地苦干,把香港亲戚弃置的电器运到工棚,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愿望很简单:不敢说致富,只盼着不再受穷;而上海的周正毅夫妇,其取名“阿毛炖品”的小店,可能还没开张。现在的海派风云人物、复星老板郭广昌,那时正啃着咸菜疙瘩走在求学的泥泞路上。

好了,不回拨了。对那些在绝望等待中被硬性取缔了财富欲望和白白耗去青春梦想的人们,我们就不要滥施同情了。他们或许在贫瘠萧索的物质生活中消磨了斗志,但或许他们也有可能意外获得单纯人性所能通往的所有幸福途径,就像《孔雀》女主角在自行车后座上给我们展示过的心灵震动:那面风帆般饱满开放的降落伞,在堕入尘土的瞬间,何尝不曾拽痛你我的肝肠?

而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人,已可以自由自在地向往财富、谈论财富,像在大白天打开自己的十指一样,轻松地随意地裸露自己的财富野心和欲望。这是一种不必害怕失去、因此也无需过分珍惜的社会进步。不是吗?从牟其中,到仰融、杨斌、周正毅,包括那些没有赶上中国百富榜排名的草莽英雄胡志标等人,时代的发展,淘尽了一批又一批巨额财富持有者,但是从未浇灭过哪怕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内心对于发家致富的深切渴望。惟一不同于旧时情节的是,以陈天桥、丁磊、张朝阳、马化腾、梁建章、马云等人为代表的财富新生代取代老一代实业家富豪登堂入室的过程,

快捷了很多,也豪气了很多,现代化了很多,以致老一代富豪们开始怀疑自己所得财富是否物有所值,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吴晓波主编的《首富》一书整理了 21 个国家的“第一富人”聚敛财富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传奇,大开大阖,有的则几乎看不出绚烂多彩之处,但是无论这些首富的生命底色如何,这种深度解读无疑可以帮助热爱财富的人们打开视窗,并以此为标杆,在喧嚣的人群背后,自我度量一番或者度量一辈子。

根据我自己的偏好,瑞典首富英格瓦·坎普拉德、德国首富阿尔布莱希特兄弟、法国首富利利雅娜·贝当古以及英国首富、俄国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等人更能让我内心崇敬。不仅因为他们低调、朴素、敬畏财富本身而不暴殄天物,而且因为他们用各自的财富,为社会大众带来了生活的便利性、丰富性和快乐的指向。

譬如宜家家居,它能让那些被做不完的工作严重碾压心灵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回到自己的宿舍后,沉湎于一种小猫式的简单而宁静的诗意幸福。我身边某位待嫁的同事,在知道宜家家居终于要在 2006 年到广州开店时,毫不犹豫地推迟买房计划,为的就是等待宜家家居;又譬如欧莱雅,它在收购“靳羽西”和“小护士”之后,并没有像宝洁、联合利华展示出强势者对新生异己势力的狡诈和残忍本能,这从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人追求和谐社会、和谐人生的美学趣味非常合拍;再譬如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他给全世界的切尔西俱乐部球迷带来的欢乐几乎是颠覆性的:在成为俱乐部东家的第二年,这支俱乐部就以强悍、永不妥协、不怕冲突的姿态横扫英国足坛,震惊欧洲各大强豪足球俱乐部,以致它的球迷得意洋洋地喊出口号:“We are fucking loaded (我们他妈有用不完的钱)!”

而相对于上述富人们舒缓人们生活节奏的情景而言,首富中的首富比尔·盖茨垄断的视窗系统,则让人们的工作节奏更快,效率更高,实际上也等同于让他们在工作中沉沦更多时光——我知道,这句话可能会引起争议和批评,它不是对真理的判断,但事实上,很多人确实因为工作紧张而自动丧失了对生活趣味、真实和单纯的品尝。患有办公室依赖症的人越来越多,在 PC 屏幕前呆坐的时间越来越长,人们将会越来越失去沟通的勇气和原本无需书本和大师唠叨的技巧,而现在,关于怎样识别上司的眼神和脸色的教导,比比皆是。

尽管如此,如果不怕“媚富”之嫌,我仍愿意把最大的尊敬给予比尔·盖茨。在对中国富人宁肯挥霍或转移财富于外国,也不乐意将财富善意回报给社会的现状表示失望之余,比尔·盖茨在年富力强就建立的这笔全球有史以来最大数额的慈善基金,比他的前辈——前世界首富们,无论安得鲁·卡内基还是约翰·洛克菲勒在晚年时的醒悟行善,都有着更积极、广泛的现实意义。

李东生 = 文

《真正的执行》

姜汝祥/著

新华出版社,2005 年 1 月

中国企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核心技术,另一个就是国际化视野。前者是我们中国企业迈向世界级水平所需要的硬件,后者是迈向世界级水平所需要的软件。

在未来的十年,TCL 的目标很明确: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再关起门来和自己比,要把对比和追赶的目标调向世界级公司,让中国制造成为优秀品质的代名词。

这是一条充满希望,同时也充满艰辛的道路,要想获胜,我们惟一要做的,就是比世界级公司更加努力,更加勤奋,要“扎硬营,打死仗”。

所谓“扎硬营”,就是营垒坚固,号令严明;所谓“打死仗”,就是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和破釜沉舟的拼搏精神。我觉得中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需要培养这种“扎硬营,打死仗”的企业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

扎硬营,就是要把企业管理的基本功练好,在企业竞争力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流程都按最佳的标准和要求把工作做到位,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正所谓,朴素的思想造就优秀的企业。实践证明,在企业竞争中,必须要把竞争力的基础打牢;单靠出奇制胜难以支撑企业持续成功。而那些文过饰非、投机取巧的经营劣习,终将葬送企业的未来。古人云:守正出奇、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年 TCL 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凡是经营得好的企业,不但方向明确、赢利模式清楚,而且苦练基本功、不断改善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

打死仗,就是要培养拼搏精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的大部分对手都要比我们强大,我们只有比对手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才可能超越他

真正的执行

们。在关键的时候,要有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勇气,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专注地把事情做好。

比如 TCL 在越南开拓业务之初,危机和困难重重,多数人主张撤出。这时,越南公司总经理却力主死战到底,并分析能成功的机会和理由。他认为若在越南市场不能成功,在其它地区更无胜算,且会严重打击团队信心和士气。他们这种在困境中死战不退的勇气,促成我们下定决心留在越南。结果,现在越南成为我们海外业务拓展最成功的国家。

TCL 强调信任与授权,同时,TCL 也强调自我责任与反省。在 TCL,我们认为作为一线主管,首先要从审视自己开始,

朴素的思想造就优秀的企业。实践证明,在企业竞争中,必须要把竞争力的基础打牢;单靠出奇制胜难以支撑企业持续成功

如果你是问题的一部分,就需要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否则你就无法得到下属对你的信任。各级主管要带头参与,承担责任,才能建立起一个开放、沟通、并得到大家共同参与的氛

围,才能把员工的活力和激情调动起来。其实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未来的战略目标是

非常清楚的,这就是致力于向世界级优秀企业学习,努力赶上并超过它们。就像当年的日本和韩国企业一样,要“扎硬营,打死仗”。从这个意义上讲,执行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中国企业未来的竞争优势问题。我相信,如果 TCL 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设计、制造、质量、销售、服务、物流等等,都做到最优,就没有人能打败 TCL。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只有不断地超越自己,特别是在成功的时

候不停止,才能保持相对领先的竞争力。

姜汝祥在《真正的执行》这本书中,提出有执行能力的人,是那些对自己有责任感的人,他们有三个特征“信守承诺,结果导向,永不言败”;一个有执行力的团队,是强调“认真第一,聪明第二”的团队;一个有执行能力的公司,一定是针对客户价值聚焦能力的公司等等。我觉得总结得很到位,这与目前中国企业所处的特殊环境与历史使命是很相符的,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想赶上并超过那些世界优秀企业,只有“扎硬营,打死仗”才有出路,不可能有什么捷径可走。

姜汝祥研究企业的角度大多从问题出发,这是我很赞同的。中国企业非常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从实际问题出发,基于事实和数据,基于中国国情,扎扎实实地做更多的建设性研究,而不是哗众取宠,断章取义。

所有成功的优秀企业背后,一定都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在支撑。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信仰、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的总和,它同时还包括企业的经营风格、员工行为习惯和应对事物的默认规则。执行问题表面上体现为业绩,但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文化问题,只有在优秀的文化背景下,才可能有真正的执行。在这方面,姜汝祥有很多精彩的观点和结论,比如从理论上提出执行是果因关系,强调企业文化必须超越利益,才能拥有真正的持续基因。在操作上提出执行前要“决心第一,成败第二”;执行结束后,要“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比如强调高层领导的责任是帮助员工进化等等。为我们打造优秀的企业执行文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养料。

企业的竞争,就是人的竞争,而人的观念、精神和勇气,往往能起关键的作用。我们若能培养出“扎硬营,打死仗”的队伍,就能让对手心存畏惧,就会在竞争中有更多的胜算。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执行。

(李东生为 TCL 集团总裁,本文为他为《真正的执行》所作的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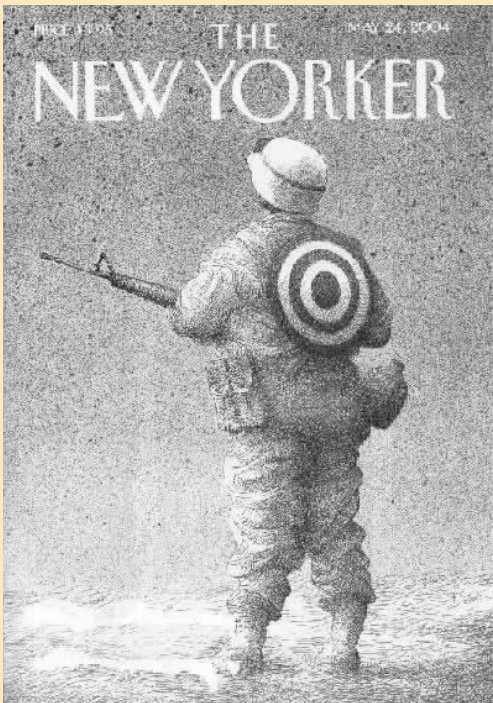
本·雅各达 = 文
于威 = 译

“newsbreak”这个栏目是把那些别的报刊上出现的文法错误、拙劣之处，或者打字错误，再配上某个人——通常是 E·B·怀特——的滑稽评论，重新登出来，填充栏目下面的空白。《生活》和《判断》很早就使用类似的补白，但是类型无一例外都是“插科打诨”——有时原创，有时就摘用其他刊物——在迪北克一定大受欢迎，但被罗斯视作无药可救的乡土气。在杂志启动一个月后，罗斯把他的想法通过公文信发给了每一位撰稿人：“我们想设立一个由胡说、废话、有趣的报纸标题、滑得像泥鳅一样的新闻发言人的讲话、打字错误等等构成的栏目。”

栏目第一次露面是在 1925 年 3 月 21 日那一期，全部都挤在一页上，形式与门肯办的《美国信使》中的“美国史料”差不多。他们不久就在栏目下面为它们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1926 年，他们又找到了讴歌它们的诗人——怀特。十年后，怀特评论道：“我始终认为 newsbreak 是我生来最乐意做的事”，而他也一直坚持到 1970 年代。当《纽约客》尚未定型，时时都在变化的时候，newsbreak 是它最完美的体现，不仅因为怀特的天才，还因为它们的出现，让最棘手的创作难题暂时可以藏在桌子底下。在创刊辞中，罗斯曾说《纽约客》“憎恨胡说”，但是发表不是胡说的幽默是一项棘手而又可怕的任务。双关语和其他文字游戏，如果不成熟或者有挠胳肢窝之嫌的当然都被排除在外。它们就是罗斯所谓的“伤害了大多数国内刊物的东西”。newsbreak 与这本杂志另一个取得立竿见影成效的栏目——配说明文字的卡通——幽默来源都是其他报刊的错误、拙劣之处或者无意间的自我暴露。这种讽刺模仿的姿态是《纽约客》之老练的第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newsbreak 和卡通让读者获得了一种微妙的但又确定无疑的高人一等的感觉，从一开始，《纽约客》吸引人的就是一种有资格要求的特权感，这种感觉不是社会的而是语言的：要想成为我们的一员，你必须“明白”这些笑话，而它们并不总是不言而喻的。“本城闲谈”用第一人称复数来撰写，并非文体上的矫揉造作，的确有一个“我们”，而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有时这种态度昭然若揭，在一篇发表于 1926 年的关于一本华盛顿传记的未署名评论中，作者对偶像破坏提出了批评，他说，“因为已经没有人崇拜英雄，对他们，我们都非常怀疑。想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国家的人口毕竟不都是由《纽约客》的读者构成。”

无论如何，newsbreak 迅速深入人心，大受欢迎。在没有征文的情况下，读者们寄来的剪报淹没了编辑部，这些都是怀特加以评注的素材。1930 年，罗斯在给一位撰稿人的信中说：“寄到这里的材料是无穷无尽的，我猜，有上百封、上千封。”

不久，《纽约客》就开始发表关于自己的 newsbreak。怀特有一次引用了耶鲁教授威廉·菲尔普斯的一次演讲：“很多人宁愿读《纽约客》也不愿读哈姆雷特。他们认为它更机智。”怀特的评论是：“噢，我们可不想杀死莎士比亚。”



憎恨胡说

另一种让胡说几乎无法容身的形式是滑稽模仿。它在 20 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像唐纳德·奥格顿和科里·福特这样的作家手里，已经得到了小小的复兴，《纽约客》能够成功地并驾轻驱熟练地运用这种形式不足为怪。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它竟然做出了发表针对自己的滑稽模仿的决定。多年来，“本城闲谈”已经从调侃的段子集合，演变成一系列简短的、幽默的有关人物、地点、事件、现象的新闻报道。但有时（通常是在第一人称复数过度滥用之时），“闲谈”的文章呈现出过于玩弄精致的危险迹象。

《纽约客》上的广告经常提到《纽约客》。派拉蒙的一个广告宣称自己是“《纽约客》最喜欢的一出戏”。还特别加注说，是《纽约客》的，不是纽约人的。李维斯和康格尔百货公司在广告中推出了一个叫普鲁斯姑妈的人物，也注明她“不是来自迪北克的老太太”。

“读者来信”是一本杂志让自己卷入争论的最容易的方式，这可能也是罗斯坚持不设这个栏目的原因之一。但是《纽约客》也会经常从信箱里挑选出一篇文章发表，再配上假正经的标题，如“觉醒的读者”、“放大镜”、“挑剔的读者”等。1926 年 3 月 13 号这期杂志，就发表了这样一封来信：

《纽约客》先生们：

我向你们发誓，很少有事情会刺激我做出给一本杂志写信这种有违尊严的事。另一方面，更少有杂志对我个人进行攻击，但是，一旦发生，我就会坚持回击。

你们当然有权利为自己沾沾自喜，但是，你们在令人恶心的广告战中，走了不正当的一步。聪明的纽约人阅读你们讨厌的杂志可能是事实，但你们凭什么暗示，体面

的人只有阅读了你们的杂志才会变聪明？胡说八道。我读《纽约客》，而我是个私酒贩子，而且几乎所有有幽默感的私酒贩子和其他人都读它。

接受我最真挚的恶心的反应。《纽约客》不聪明。请不要再恶意对待那些用自己的善钱支持你们的愚蠢的滑稽的人们，讲点礼貌。我们可能不完美，但上帝知道我们不聪明。

到此为止

里·费斯

1930 年《读者文摘》那封信被放在“难题解答”名下，这个标题是为那些确实需要答案的来信设置的，后面同样会有一个幽默的回答。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的调侃与荒谬的样本中，为这封信提出的问题所做的答案异乎寻常地严肃。在过去的 5 年半里，虽然不断提及自己，但这本杂志对自己的编辑要求始终不清晰，也不完整。而这封信到来之时，《纽约客》正处在一个被几种不同的、甚至毫不相容的力量拉扯着的时期。五年多的时间里，各种因素让这本杂志抵抗住了内在的冲突，生存下来，甚至日渐兴旺。这些冲突诞生在创刊时的兴奋之中，后又因编辑和作者们对自己聪明的自得而加剧。怀特在写于几十年后的几封信里曾提及：“罗斯创办这本杂志，更多是出于对那些已经出版了的东西的蔑视，并没有任何改善它的想法。”因此，这本杂志在头几年里奉行的原则就是和别人对着干。当然，罗斯也用管理流程图和办公室平面图添了不少乱。

但现在的感觉像是走进了死胡同。凯瑟琳·怀特，（她在 1925 年受聘于《纽约客》负责阅读来稿，那时还叫凯瑟琳·安吉尔，当她嫁给怀特时，已经是杂志的文学主编）想要提醒罗斯问题的严重性，她在 1931 年的备忘录中写道：

这本杂志除了日常组织运作，更需要创意、讨论，把为这本杂志写稿子的人找过来，一起想想应该发表什么样的东西。每次我离开时都怀有这样的幻想：你以前有过的、现在却各奔东西的核心人物能重新聚在一起，兴冲冲地想着好法子，重新打起精神，在以前的基础上再次出发。

听她的语气，似乎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已经四分五裂，但是，除了拉夫·英格乐索——这位早期的救世主之一，也是“本城闲谈”的内容和特质的主要确立者——于 1930 年离开加入亨利·鲁斯旗下的商业杂志《财富》以外，其他的人都在。事实上，他们构成了这本杂志的编辑心脏、灵魂和良知。除了她自己，她丈夫还有罗斯，她还提到了伍尔科特·吉布斯和詹姆斯·索伯。后者是俄亥俄人，1927 年进入《纽约客》，在当过一阵短命的执行主编后，他成为“本城闲谈”的改定主笔，而且也是一位幽默随笔、素描和故事的多产作家。这五个人，虽然感觉相距十万八千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非凡的智力和对流行的、不通世故的或者陈腐的东西的发自内心的厌恶。但是现在，即使这五个核心人物也正在把《纽约客》往不同的方向拉。

（本文为《About Town》一书连载）

解析媒介当代迷思

胡正荣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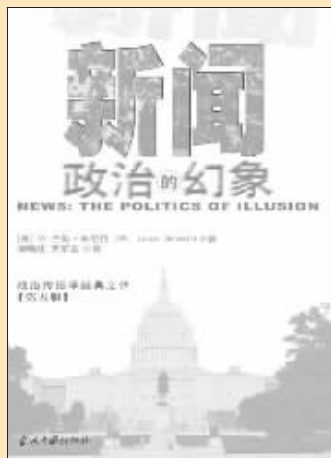
自西方世界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大众社会形成以来,有关大众媒介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就已然成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激烈讨论的话题。政治议题的形成、传播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公共领域的变迁、媒介职业和内容生产……无论从哪种认知取向或研究范式来看,新闻媒介在社会民主化中的巨大作用都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就政治传播的探讨来说,9·11之后的世界自然而然地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当然,政治与传媒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民主社会的影响早已不是什么新话题,但是那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日子过后,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的确在不断地给已有的各种观点和争鸣带来新的典型例证:从伊战前后美国大众媒体所制造的舆论神话到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部分媒体旗帜鲜明的党派立场;从BBC、半岛电视台等“独立媒体”与政权斗争中的尴尬处境到跨国媒介资本无孔不入的全球扩张,政治、资本与媒体在世纪之交的世界舞台上,给我们演绎着难以捉摸的当代迷思。

美国社会在政治传播的探讨中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和新闻媒介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以“幻象政治”为关键概念,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的著作《新闻:政治的幻象》对美国当代媒体的运作过程和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做了比较全面细致的解析。著作中对政治传播中一些基本元素和机理的分析,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借鉴。

作者首先概括性地探讨了新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内在复杂的关系给出了若干基本的假设和论断,以此解释新闻背后的奥妙。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几个有意义的基本问题,也许对我们看清商业媒体的本质很有帮助,比如“为什么言论自由不能保证好新闻”、“被媒体修饰过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前一个问题很好地诠释了商业利益驱动下,媒体言论

自由与社会民主的悖论,而在后一个问题中,作者则切中了他提出的关键概念“幻象政治”。充斥着情节化的故事和“权威人士”的“政治欺骗”,新闻已经越来越缺乏分析和解释性的内容,这使得公民的批判意识逐渐弱化,“当人们依照一种主流的政治画面来作出判断的时候,这种画面本身就会自我放大,创造出可能并不真正存在的世界。”

既然新闻媒介制造了“幻象政治”,那么这种幻象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新闻媒介制造“幻象政治”这一现象的根源又何在?对新闻内容中信息倾向性的分析,也许能很好地解释第一个问题,相关问题也是目前西方传播学界沿着定量思路研究的一个热门主题。而班尼特在这里将政治压力和社会变迁下新闻信息倾向性概括为个人化、戏剧化、碎片化和权威主义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总结。这四种倾向性可以解释已经沦为批量生产的消费品的新闻,为什么没有像理想中那样促进民主事业的发展而往往成为一种阻力。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很难再找到比政治经济学分析更有解释力的范式了。作者从三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新闻业变迁背后的经济根源:第一,新闻业的“企业利润法则”;第二,媒介垄断带来的信息垄断及其对新闻的种种负面影响;第三,媒介系统外的经济力量如何对新闻施加影响。同时,作者还借题发挥,讨论了互联网等新技术对社



《新闻:政治的幻象》
[美]兰斯·班尼特/著
杨晓红 王家全/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1月

会民主化的影响,以及公共领域缩小的问题。

要想对“幻象政治”有一个更加感性的认识,就要深入到这种意义产生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乔姆斯基所说的“制造同意”的全过程。在书的后半部分,班尼特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来介绍。首先,从信息的来源上,作者分析了政治家们是如何制造新闻的,其中涉及了媒体和政府的关系、符号政治和形象塑造的技巧以及新闻管理等问题。接下来,沿着媒介职业的从业者和机构分析的思路,作者从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压力、组织压力、工作惯例和新闻行业标准化的专业主义,来看新闻内容的产生所受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制约。最后,当然还要涉及到新闻受众对新闻制造的“幻象政治”无可奈何的解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到了公民解读新闻过程中遇到的两难,并把它们概括为“相信谁”和“相信什么”,无论从新闻与政治经济力量的微妙关系来看,还是从新闻制造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实我们很难将“相信谁”和“相信什么”加以并列和区分,在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媒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渗透之下,不仅是被解读的客体——新闻是被生产和控制的,解读的主体——人的头脑也是被生产和控制的,这就是消费文化和资本扩张与统治的需要,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因此,不仅难在相信谁和相信什么,更难在解读所依从的价值体系、解读过程和方式本身已经无法逃脱主流的控制,受众更多的不是面对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选择的问题。因此,“两难”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将现行制度合法化的思维局限性。

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华尔街日报》一位编辑曾说:“一张报纸是一家私人企业,它不欠公众任何东西,公众也没有特许它经营权,因此它不受公众利益的影响”,这番言论毫不客气地亵渎了社会责任的神话,因为它切中了制度本身的要害。可见,大多数社会理论,包括媒介理论总是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着眼于全球范围内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繁杂多样,在政

治传播的问题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可以任意套用的宏大理论。另外,班尼特的这部论据有力、例证充足的著作也并没有展示出一个分析相关问题的严谨学术框架。但是作者多维的视角和多样化的研究范式,以及对美国新闻行业制造“幻象政治”的复杂机理的分析,甚至著作的局限性本身,还都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并对我们惯有的一些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

班尼特的著作给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线性的、缺乏批判和质疑的单向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着眼现实,近几年中国媒介改革所大力推进的市场化、集团化是否能带来新闻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民主发展,或者说这些变革将会对中国公众利益和公共领域产生何种影响?我们迎合市场、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打造“国家队”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会不会重蹈拉美或东亚部分国家“裙带资本主义”的覆辙?这些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近几年媒介行业中愈演愈烈的寻租恶习,以及充斥电视荧屏的虚伪的“人文关怀”和“公共”概念的假借,已经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特定环境下媒介在现代化中的角色和作用。

CULTURE

郭玉洁 = 文

《童年的消逝》

[美]尼尔·波兹曼/著

吴燕荭/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5月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动人的作品常常是一曲挽歌。这二十多年来，无论原因何在，中国社会都经历了加速度式的变化。变化之广，几乎遍及每个角落，裹挟每一个体。变化之速，可谓日新月异。以五年为期，则白云苍狗。但新的更替过于频繁，就意味着更多的旧，更多的废墟。往昔人们赖以生存的物事、人情，都在迅速脱落。甚至一些刚刚登上波峰的新，也很快跌落到谷底，被人遗忘。

一方面，人们无可挽回的被狂风刮向未来，只有当下，没有历史；另一方面，在一些心酸眼亮的刹那，也会对遗失了的世界，深感困惑和痛惜。固执的人们试图拾起废墟的碎片，拼成关于过去的完整图景——早有人说过这是徒劳，但对于纠结在变革中的人们来说，不能理清过去，则根本无以理解现在。

这就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反之，如果人们热衷于怀念和研究某样东西，那么这也许就是最后的哀歌。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用这句话来解释关于“童年”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繁盛。“童年的消逝”、“童年之死”，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正明示了他们的观点，恰如临终告别仪式，而不再是一个警告。

“童年”如何可以死掉？

有死必有生。哀悼者的共识是，“童年”不是一个永恒的幻象，它不同于婴儿期，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而是一种社会产物，一个历史概念。尼尔·波兹曼指出，假如把“儿童”定义为7岁-17岁之间，需要特殊形式的抚育和保护，并相信他们在本质上和成人不同，那么，“儿童”的存在还不到400



童年：生死未卜

年。它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有赖于印刷术发明之后、阅读识字文化的兴起。

波兹曼对于印刷品时代和电子时代的关注是一贯的，在这里，他指出，印刷品形成的阅读文化，首先建构了成人。想像一个面对书本的、孤独的读者，如果说抄写文化压抑了人的自恋情结，那么，印刷品解放了它。阅读这一孤独的行为，不同于口语文化，它帮助形成了个人主义。同时，印刷品的风行与文艺复兴思潮互为表里，结果是，新的“成人”出现了。这个成人并非易与之辈，他是个性化的，掌握了阅读的能力、概念思维的能力，有对印刷文字权威的信赖，有对清晰、有序和说理能力的热爱。如此，未成年人要经过学习阅读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成为成人。

童年就在这个意义上，首先被分隔在成人之外。

为了使儿童成长为“成人”，初级教育大力发展、现代家庭逐步成型、家长成为监护人、教育者。从制度上，童年的疆域与路线逐渐清晰起来。而18

世纪以来，哲学家洛克、卢梭、弗洛伊德和杜威对童年的研究和诠释，使得“童年”的概念趋于完善，“儿童的自我和个性必须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其自我控制、延迟的满足感、逻辑思维的能力必须被扩展，其生活之事必须在成人控制之下。而同时，人们应理解儿童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儿童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这些不应被扼杀。”

童年的疆界止于成人，二者之间有一道鸿沟。成人的世界，拥有儿童所不能了解的事，有知识、思考能力，也有性、暴力。人们确信，必须逐步的让儿童学习和了解这些秘密，才能成长为理性、健康的人。因此，秘密和鸿沟，是童年得以存在的前提。

与之相对的是，在中世纪，知识被垄断在教会手中，普通民众没有读书识字的能力。儿童和成人共享口语文化，生活在和成人一样的社会范围，做同样的游戏，穿同样的衣服。其结果是成人化的儿童，和儿童化的成人。作者引用一些资料指出，中世纪的成

人言行通常都很幼稚，而儿童，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一个7岁的男孩都是一个男人，除了不会发动战争，不会做爱。”

令波兹曼悲哀的是，中世纪这一幕重演了。

如同将印刷品时代的福音归于印刷机的发明者一样，他找到了纽约大学的塞缪尔·莫尔斯来为电子时代的噩梦负责。1832年，正是莫尔斯发送了地球上第一份公共电子信息——电报。此后，时间的观念、世界都改变了。一个即时的、信息泛滥的时代出现了。电视取代了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的特征，文字教育的严谨显得没有意义。电视消弥了成人和儿童的鸿沟，它没有复杂的技巧，儿童很容易学会，而那里面，曾经独属成年世界的秘密一览无余。

现在，也许可以设想一个坐在电视机前面，同样孤独的儿童，成人已无秘密可言，而他还没有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成人也已经远离了书籍所代表的理性、慎思的文化，逐渐变得儿童化了。

“一个由印刷术而兴起的以文字为主宰的‘文字说明时代’，虽然赋予成人与众不同的头脑，但这个时代已近尾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叙事时代，如果要表达得更准确，更形象化，应该说是‘娱乐时代’。”

在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对于童年逝去的感怀，不如说是对时代的凭吊。正如1996年，苏珊·桑塔格发表了致博尔赫斯的一封信：“书籍现在被认为正濒临灭亡。我说到书籍时还泛指文学成为可能和给灵魂带来影响的阅读条件。……当书籍变成了我们依据实用性标准跟它们进行‘互动’的‘文本’时，书写的文字将会简单地变为一种被广告所驱动电视画面。这就是正在创造中的，并向我们保证能够变得更加‘民主’的辉煌未来。当然，它只意味着内心世界的死亡——以及书籍的死亡。”“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纵火焚书的必要了。野蛮民族无需烧书。老虎就在图书馆里。”

(下转22页)

优雅问题

吴海蔓 = 文

《优雅》

[法]德阿里奥/文 曾森/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5年1月

有不希望自己优雅的女人吗？没有，包括我那刚刚生产后发了福的妹妹。

幼儿园的老师给我上了第一堂关于优雅的课程。她不过是我斜斜的蝴蝶结移到发际中间，据说这就是白雪公主的蝴蝶大法。此后我对优雅这个特性一直默默研究。我还曾一度设想在退休之后就立刻投入建设淑女学堂，但如今这已经被各路人士勇敢地实践，有一家淑女学堂就公然开在我家附近。

《优雅》本来是为了我退休计划购买的系列书籍之一。如今这类书有点多了，不得不谨慎一些。这本《优雅》没用美女的肖像来做封面，更得到我几分信任。考虑到自身条件，我偏向于把优雅不等同于美丽的书，我还特别给持相同

观点的作者捧场。这位女作家因为是法国人，我又多添了几分喜欢。

吃饭时怎么摆放刀叉，坐下来时怎么摆放腿。一些最平庸的建议，没有在这本书里占掉什么篇幅，相反，作者提出了这点建议——“除了夜晚之外，不要穿任何露背的服装”。这可是一位外国友人对优雅的解读。

中国职业女性在各大办公室里似乎已经不再拘泥于穿严实的套装了，夏天的时候更是这样。而且中国女性说话的嗓门也很大。我就是一个大嗓门。优雅，得从灵魂深处的改造开始。而且估计是已经完成了种种美学历程之后的最终产物，比如说，已经学会挑选适合自己的颜色和服装款式；懂得哪种男人适合自己；知道生活中的快乐是什么；如果有可能还少说甚至不说错别字。《今日美国》报纸创始人的太太就是因为在一次集体会议上念了两个错别字，而埋下了十多年后离婚的祸根。我一直阅读《咬文嚼字》小开本杂志。

在很多工作场合，我见过中国很多一把手的女领导，但她们连研究穿

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一位通讯行业的女巨头，她不修边幅到了可以混迹于江湖的地步。倘若这些声名遐迩的女领导都是优雅的话，那该如何震住我们的国外友人。倘若她们是优雅的话，她们手下那些年轻的女子，该如何受益并好好学习。倘若她们是优雅的话，她们的先生将如何加倍荣耀。

我仔细看了一下淑女学堂的各种课程，唱歌课是为了应付下班后的卡拉OK，跳舞等运动课是为了保持身材。还有一些绘画和插花课。这些动辄上万的课程就是我们通向优雅的路径？

优雅，可能还要一点善良的心；能自嘲，不着急上火。上司冤枉你了，也不急着跳槽。同事有急事的时候，愿意借几个应急的钱。优雅可能就是来自于掌握自己生活的那份顾盼自得。一位富有的绅士曾肯定地告诉我，他太太每天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见过这位太太，她的确过着她热爱的生活。她跟我们一样工作着，但多了份悠闲自在。平凡的女人们每天在争夺、争取、争斗中要占掉多少看书和打扮自

己的时光呢？

优雅需要铺垫，还要实践。还格外需要金钱的滋润、自由的培育、爱的维护。优雅就是所有美丽的集大成者。各路明星犹如昨夜星辰，依然在世界人民心底闪烁的，第一位就是奥黛丽·赫本。另一位格蕾丝·凯丽，其实也可以排在第一位，她的英文名字不就是优雅(grace)吗？但赫本把自己献给了世界的儿童，而凯丽把自己献给了一位国王。

大俗大雅的问题，不在此次的闲谈范围。



最近，书市上一本叫做《思想力》的书实得特红火。这本厚重的管理类书籍从去年出版以来迭经再版，不断创造销售新高。伴随着大连国际DNA和基因组计划的启动，这本书更是引来众多目光对其进行瞩目。因为，许多人都想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为什么诺贝尔奖科学家对这本书的作者陈玉松及其著名的珍美美国公司一直“耿耿于怀”。不愿放手？

在陈玉松的新书《思想力》中，作者为人们展示了一个高科技运作下的保健品公司，如何与诺贝尔奖科学家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合作与交流，从而提升了自己的品牌，打造出产品的高科技含量。

此次是诺贝尔奖科学家第五次造访珍奥，此前已有四位诺奖得主分别在2002、2003和2004年访问过珍奥。这次前来的5位诺奖得主，除了珍奥德博士已与珍奥签订的合作外，另有两位也主动表达了与珍奥合作的迫切意向。被誉为“内舒之父”的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里德·848226；穆拉德博士在2005年4月25日与珍奥集团签署了合作意向书时说：“通过参加2005中国（大连）国际DNA和基因组计划，我实地考察了珍奥公司，对这家企业的实力、理念、管理非常欣赏，决定用自己拥有的一氧化氮相关营养品、药品、化妆品方面的技术与珍奥合作。在中国进行产业化，我们之间合约细节将在两个月内敲定。”这才是陈玉松陈令在《思想力》这本书中最有创意的地方。

陈玉松是个商人。他在一次媒体的采访中谈到，他喜欢做商人是因为只要企业合法，就可以在商业领域中尽情驰骋，发挥自己的才干。进过这一领域后，越来越多的人帮助他成就了事业，而他又将这种激情回馈给社会。2005年4月25日，在大连国际组织委员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公布了民政部评出的2005年度中国十大慈善家，珍奥集团董事长陈玉松因在老年福利事业方面的特殊贡献而获此殊荣。全政协副主席郑建秀出席发布会并为获奖人颁奖。

近期，国际DNA和基因组计划已在大连召开。对这次盛会倍受关注的珍奥集团，又一次将眼光对准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仅如此，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相关领导、专家还就D-羟珍奥生命因为珍奥诺贝尔奖生命科技、珍奥诺贝尔奖国际合作伙伴平台、珍奥诺贝尔奖科学家陈玉松、捐赠、剪彩、并举行签约仪式。

陈玉松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力，已经将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



“如果生下来怎样选择？”对于书中的主人公“猪”公来说无疑于那个或者死去。这是像许多武侠小说，《魔法猪世纪》的主人公猪公生来就是为了一切，都是为了就是其全部的生涯这一切，都源于……

按照作者的设定，猪曾经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无姓者之后的——不可避免的人与猪会因为争夺资源而大打出手，最后猪耗尽了猪的身心疲惫不堪，人类则回归于蛮荒中的原始社会。随着人类奋斗不息，终于控制了整个世界，他们回去按文明的全部遗迹，同时编造种种谎言，将恐龙的灭绝归于自然现象，并饲养起残存的猪，取其为食，使它们永远奴役。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头猪出现了，带着它所掌握的一切魔法出现了……

故事就是这么展开的。几个卡通人物通力合作，演绎了一出荒诞却不失纯真的幻想之旅。从开端来看，一开始进入得就很快，而且动感十足，色彩斑斓，注定会在短时间内就吸引住小读者。

从大的角度来看，《魔法猪世纪》属于幻想卡通。从想到现在的卡通已经开始拿枪来开刀了，不过这显然是因为猪具备那些相应的元素：形象可爱，易于搞笑。不过不行，我们已经先天地被决定做人，好吧，那现在我们把猪与人来个换位，让猪思考，让猪发愤，让猪肩负起推动文明的使命，而我们人类呢，乐得逍遥，如同书中的小主人公（这可是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玩得一手好兵，故事打打杀杀；当然，如同卡通作品中的大多数的小主人公一样，她还有点讨厌学习。

不能不说这不是一种遗憾，《魔法猪世纪》的小主人公在经典的教育范式下可以说一无是处，可你能肯定她就没有值得孩子们学习的地方吗？我相信一个真正认真看这本书的小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发现的闪光点。当然，也或许你说一点小小的困惑：愿意得着零分的学生和爱打架的女孩却竟无足轻重，假如卡通猪猪总是这么消极或地面对和合读者，就真有点远离生活的本来状态了。

也许这一类型的卡通，能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稍微赶上那么一小步，而在现代孩子和揭示他们真正生活的道路上这还是一小步，虽说仅仅只是一小步。

是一头猪，你会《魔法猪世纪》说，这个问题也名的论述：“活着一个问题”。小说的主题——《魔法猪世纪》的主“猪”更优，或者说这活目的，而所有那遥远的过去

设定，猪曾经是主宰，而人类则后起之秀。于是

少年儿童时期是人生最好的黄金时期。人们常常将人的这一时期称之为金色年华。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本应该是十分快乐的。可是，细心的人们却不难发现，我们周围有很多孩子却成长得并不快乐。

据教育部统计，全国两亿多未成年人口中，认为自己心理上不舒服的占到1/3。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为什么在物质条件相对十分优越的今天，却有那么多孩子成长得不快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家庭的责任，父母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范围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做的调查统计表明，在10万个成年人士中，90%以上的人士认为家庭教育为他们的成就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80%的人士还认为，母亲对他们的成功人生更为重要。

如何改变自己，做一个能让孩子快乐成长的“合格”父母？您必须了解一些家庭教育的基本规律，以便正确地教育，引导自己的孩子。如果家长的教育知识匮乏，教育方法不恰当，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相信，绝大多数父母都不愿意因为自己拙于学习教育艺术而耽误孩子的前途，都不愿意因自己的教育方法不当而使孩子在金色的年华里失去灿烂的笑容。本书是关于少年儿童教育的宝典，作者在书中以专家且首先是以家长的角度观察到现阶段我国家庭教育中造成孩子不快乐的种种烦恼，他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今少年儿童不能快乐成长的第一手材料，运用古今中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家庭教育实践，深刻剖析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种种误区，分析了家庭教育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案例，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少年儿童快乐成长的一般规律，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且操作性强育儿方法，力求让每一位父母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科学地教育和引导孩子，使孩子快快乐乐地学习，健健康康地成长。

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说过：“人人皆能成功”。我相信，只要您能细心阅读此书，并创造过地去实践书中所提供的方法，您就一定能够充分挖掘孩子的潜能，使孩子学得开开心心，成长得快快乐乐。

祝您做个最称职的家长！

祝您孩子成为最上进、最快乐的孩子！



触摸一代人

李翔=文

我 终于还是无法真正触摸到徐晓和她那一代人的生活

和思想。
我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的话。她和我年龄相若,都出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次,她很随意地拿起桌上徐晓的书,开始阅读。十几分钟之后,她说:“我为什么并不觉得感动?别人都说《永远的五月》写得很感人。”

“那可能是因为你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我说。

我也不太相信。他们那一代人对



他人所具有的那种感情,在我们身上正在消逝。我和我所处的一代人,已经习惯了孤独的童年和长大后多样得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我才不在乎她所说的那些东西呢。我更感兴趣的是她所在的《今天》杂志的团队,这是出于我对历史寻根问底般的爱好。让我失望的是她用充沛的感情来代替我想要看到的丰富的信息量,毕竟,徐晓是个散文家,而不是历史学家。

但一位年长于我的同事却对这本书赞不绝口。她说自己用了一夜把这本书读完了,而且她想要买一本送给自己的亲戚,因为她觉得他们的经历很相像。

这让我想起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汤姆·布洛考所描述的美国的代际鸿沟。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难以被他们的子孙所了解。这一代人,他们求学时碰到的是经济危机,最常见的景象是,在一个黄昏,父亲请自己的儿子喝啤酒,然后父亲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说:“实在抱歉,

我没有钱让你继续读书。”当他们长大之后,国家和世界又要求他们去承担战争所需要的义务。没有比他们更乐观和更大公无私的一代人了。一位护士回忆说,一个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问她,是否觉得现在的样子惨了点。几个小时后,这位伤员伤重身亡了。这些独特的经历所带给他们的感情让接下来的一代人无法理解。他们无法理解为何诺曼底登陆纪念日有无数陌生人互相询问那天你在哪里。

同样地,我所处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并不能理解徐晓那一代人。我怀着好奇心同她交谈,我觉得自己甚至能描绘出那一代人的大致特征。但是,

就像电影中常见的场景,一位穷孩子对商店橱窗中的商品望眼欲穿,而且它似乎就在眼前伸手可及,可是当他真正把手伸出想要获取的时候,触摸到的却是有些坚硬和寒冷的玻璃窗。

如何理解一代人?

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出生,他们经历了建国之后这个国家所有不成功的试验,物质上的大炼钢铁、浮夸风、大跃进,精神和政治上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能正常地接受教育。滋养他们精神的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 19 世纪俄国文学,和后来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等等我这些后来者感到陌生的东西。如果让这代人列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几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加缪、尼采等人必定名列前茅。他们中为我们熟悉的佼佼者则是李泽厚、北岛等人。

我还有什么?

除了阅读之外,我始终无法想到

更多地去理解他们的方法。我知道,今年是萨特诞辰 100 周年,可是萨特对于我来说没有丝毫意义。这位立志于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的法国人,在我脑子里仅仅是一个符号:他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之一,他是 20 世纪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是福柯之前最明星化的哲学家。可对于他们就不一样。在 1980 年代初大学里流行的是萨特的书,存在主义哲学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书店,当我看到一位年龄比我还小的女孩在翻阅萨特的《寄语海狸》时,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这个人对于她父辈们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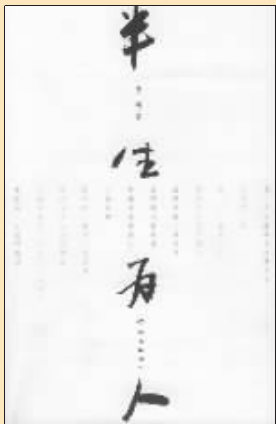
我同样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今天》。除了北岛之外,她是否知道这个团体中的其他人。她可能和我一样缺乏获悉这些刚刚和我们擦肩而过的历史的渠道。我不知道他们年轻时的生活,是否枯燥,大家读着相同的书,谈论着相同的话题。他们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没有可口可乐的日子怎么过?

但这一段并不太远的历史,只能依靠口口相传流传下去。它的流传方式回到印刷术发明之前,显得有些遥远和陌生。

当我第一次觉得有必要了解他们时,我觉得那应当是枯燥无味的,大家争论着我们看来可笑的话题,勇敢坚持着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说,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消灭失业问题,很难想像那时的经济学家们会为这个问题进行有风险的争论。华东师范大学研究思想史的教授许纪霖说,他们那一代人的人生最有可能在几个时期内成型:红卫兵时期、上山下乡时期或大学时期。这些时期可能缔造出王小波般的平民自由主义,也可能缔造出带着浪漫情怀的理想主义,比如那些在 1980 年代空前活跃的诗人。

他们的回忆和我自以为是的揣测完全两样。事实是,那是一段少有的活跃时期。他们可以举出一大堆我不太熟悉的杂志名字和丛书名称来支撑他们的话。当然他们也无需证明给我看,我只是一个妄想窥视他们曾经生活的年代的陌生人而已。我读着和他们不同的书,说着和他们不同的话,我没有参与过他们之间的辩论,难以理解他们的话题,有时候甚至对他们热衷的事物表现出傲慢和不屑一顾。

“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和年轻一代



《半生为人》

徐晓/著

同心出版社

2005 年 1 月

写作者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我们这代人有着更为清晰的价值、观念和祈望,理想主义是我们这代人的基调。我们都是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为摆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化的影响,我们需要不断地反省和超越自己。”徐晓自己这样解释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今天的年轻人,价值观念日益模糊。比如说,我们可以怀疑很多东西,但我们总知道什么是我们想要追求和试图去建立的;而年轻人则似乎怀疑一切,却又不知道想追求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代际差别。另外,今天的社会是如此的纷繁——不再有单一的意识形态、观念或者能够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兴趣——一种单纯的文学样式、甚至一种文学潮流,要像早期《今天》杂志那样感召许多人,事实上完全不可能了,理想主义受到质疑甚至嘲弄。”

我完全明白她所说的话。这也是我思索过的问题。当她坐到我对面,她身上那种活力让我震惊,从她食指和中指间的烟所散发出的烟圈,就像我们幻想中的山间炊烟般让人浮想联翩。除了她所讲的差别之外,我意识到,还存在另外一种差别:她们对知识和人所具备的那种热情,在我们身上,表现出的是对信息量的机械渴求和对单纯快感的追求。我们很难获得那种热情和丰富的感情,或者说很难长久地拥有她们身上的那种热情和感情。

必须感谢徐晓,她的絮絮叨叨为我提供了一次触摸她们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的机会。无论能否成功——会不会碰到玻璃橱窗,这一次是最近的。

《告别演说》的难言之隐

——2002 年普利策获奖图书《建国兄弟》评述(之二)

连清川 = 文

1796 年 9 月 19 日,在费城出版的《美国广告商日报》内页,出现了一篇“写给美国人民的信”,署名是乔治·华盛顿,内容是他宣告推却再次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正式告知美国人民他要退休了。从第二天开始,美国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篇后来被称为《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的文章。

登时整个美国都陷入了慌张之中。他是这个脆弱国家的精神和政治领袖,是他带领着他们从英国殖民者手里争得了独立,是他带领他们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府,是他带领他们建立了一个建基在宗教、法律和道德之上的国家。他们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兄弟、他们不加冕的国王、他们的道德榜样……现在他说:一切都靠你们自己,我走了!

事实就这样了。1797 年 3 月,华盛顿推却了所有的政治责任,回到他在弗吉尼亚的弗农山庄,再也没有过问国事。《告别演说》是美国历史上再重要不过的历史文献,它奠定了美国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除了二战时期国会特别通过法律暂时允许罗斯福豁免之外)的政治传统,而且其中对许多内外政策的建议,已经成为了美国不可打破的金科玉律。

可是,华盛顿的离开,真的是一场毫无瑕疵的政治光荣剧?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在联邦政府的权威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而南部数州还在寻求分裂之时,为什么华盛顿如此“不负责任”地就走了?

光荣领袖的背后责难

1787 年,在坚推不就的情况下,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美国总统。他从来都担心自己的权威会导致这个国家对于领袖和领袖权力的迷信。而他对于权力的不眷恋却只能增加人民对他的信任和依赖。“攻击华盛顿,在那个革命时代里,是最快的政治自杀行为。”艾里斯写到这里评论说,“他如此独立地完成了他的义务,以至于他看起来像是在否定共和国的传统;他如此成功地使国家权威成为现实,以



至于任何对政府政策的攻击都变成了对他个人的攻击。”

这是一个伟大、光荣、没有缺点的领袖,难道每个人不应当为此感到庆幸吗?托马斯·杰佛逊却非常担忧。首先,华盛顿这种超越凡人的权威使他如坐针毡。即便华盛顿曾经不迷恋权力,但是谁知道随着时移日异,人会不会有变化?而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威就更是一个危险:任何华盛顿的动议,总是能够在人民和国会中通过批准,而哪一个人,哪怕一个再伟大、再正确的领袖不会犯错误?华盛顿一个人的威望,已经扼杀了所有的异议声音。他虽然没有加冕也不会加冕,但这和国王有什么区别?第二,杰佛逊的确认为华盛顿的执政有问题。1794 年,宾夕法尼亚发生了一场针对联邦政府收取威士忌酒税的叛乱,华盛顿进行了镇压。这在杰佛逊看来,简直就是英国殖民政府的翻版:美国独立革命,不就是起源于对殖民政府税收政策的抵抗吗?第三,杰佛逊怀疑华盛顿对于独立战争意义的诠释。华盛顿执政期间,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了。华盛顿的态度是中立、观望、远离。但是杰佛逊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和美国独立革命的精神是一致的,一个建立在伟大理想基础上的美国,当然应该坚决站立在法国人民一边,抵抗王朝。而且在美国人民对抗英国殖民政府期间,法国人民给予了无私的支持,难道美国人民不应该还这个人情?

潘恩和杰佛逊并不是质疑华盛顿的惟一个案。在公开层次里,就像“山呼万岁”一样,每个人都尊崇着他,但是,在背地里,对于华盛顿的权威和权力的质疑,在 1797 年的时候,已经成

了一股给国家带来危机的暗潮。

伟大与特殊

华盛顿何尝不知道杰佛逊和其他政治领袖对自己的不满。早在与殖民地贵族共事时,他就已经了解并掌握了这种政治斗争明枪暗箭的袖里乾坤。

事实上,除了对其权威的质疑之外,当时他的另外一个政治决策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正在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华盛顿派了《联邦党人文集》的另外一个作者,约翰·杰伊和英国进行了一场秘密谈判,并且签定了《杰伊条约》(Jay's Treaty),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承认英国的海上控制权,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且赔偿独立战争之前美国所欠英国的债务。作为交换,英国答应从美国的西部边境撤军,并且保护美国和英国的贸易利益。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精明的交换”,因为与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英国的贸易关系和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使美国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和巨大的贸易利润,美国西进才有了可能性。

但在那个时候,刚刚和英国打完一场生死对抗战争,与之妥协形同“卖国”,更何况是如此低声下气的条约。杰佛逊就是强烈地反对《杰伊条约》的人之一。他认为,这是对《独立宣言》、对为美国独立而流血牺牲的先烈们的背弃。

华盛顿和杰佛逊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有着不同的解释。华盛顿认为,这个国家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应当对合法当选了的官员服从;即法律就是法律。但杰佛逊认为,所有与独立战争的革命精神相违背的,无论是法律,还是条约,都不具有合法性。

华盛顿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总统,包括一个革命领袖所拥有的权威,早就有深刻的认识。但是,他作为一个政府的最高领袖,尤其当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对于革命意义的不同阐释,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越来越强烈的对抗性,南部诸州的分离倾向,奴隶制废除与否的全国性争拗,宪法能否顺利实施的危险等等之时,他必须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来为这艘脆弱的航船保驾护航,因此他必

须当一个“共和君主”。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那时承认了自己的权望高过了一个总统应该有的水准。

但是,华盛顿在 1796 年,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争议性将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这场风暴与他所要维持的航船的稳定性是冲突的。他或许可以再一次运用自己的权力夺得话语权,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美国。

以前,他的伟大和这个国家相容,为了国家,他必须牢牢掌握权力;现在,他的伟大和这个国家相斥,为了国家,他必须放弃权力。

这篇从来没有被演讲过的《告别演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来的。华盛顿心拟,汉密尔顿手拟。告别辞的本意并不是华盛顿要展示自己的伟大(在那个时候毋宁说是放弃自己的责任),而只是苦口婆心地劝诫美国人民和将来的政府,要保持政府的统一、保持对执政者的警惕、保持国际中立、保持自由的精神。

这就是《告别演说》的难言之隐,因为国家的特殊性,他背上了君主的恶名;而为了国家的特殊性,他又背上了逃兵的恶名。幸运的是,他如此隐微的伟大,却在国家的历史中显现出来,尽管人民从来都没有正确理解过他的登基与退位,但是他的苦心,却为国家创造了光荣的未来。



置身电视

隆·莱博 = 文

《思考电视》

[美]隆·莱博/著 葛忠明/译

中华书局

2005 年 1 月

回顾我的童年，特别是小学及初中时期，我发现除了我们模仿的电视节目和故事，以及我们喜欢或讨厌的电视人物外，收看电视对我及我的家人而言，是一种意义并不那么明确的复杂活动。我最早关于电视的记忆，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与姐姐一起欣赏整个下午播个不停的卡通片和各种电影。我同样也能回忆起那些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夜晚，母亲和继父在那两天晚上通常会外出。尽管有些犹豫，他们还是赋予姐姐“照看”我的责任。当她不是忙着和朋友在电话上聊个不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些爆米花、冰淇淋、蛋糕，或其他什么东西，把电视调到晚间电影频道欣赏电影，如《木乃伊》、《隐形人》和《作法自毙》等。即使是现在，我依然能体验到观看这些恐怖电影时的感觉，自姐姐和哥哥离家以后，家里就只有母亲、继父和我了。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说，看电视是使我们三人呆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在同一时刻，呆在同一间房子里，相互分享各自的体验。那些永无穷尽的节目，绝大多数是程式性的，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却能使我们不争不吵地观看；而当家庭出现冲突、紧张的时候，我们总是利用电视造就的安逸氛围解决这些冲突。即便我们很少就那些在外人，特别是在中产阶级看来意义重大的事件相互交换意见，我想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三人都知道电视能让我们

团聚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电视逐渐成为我们分享生活体验的重要方式。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回忆起和我的继父一起收看《科杰克》(Kojok, 美国 70 年代上演的电视警匪片)、《培瑞塔》(Baretta, 美国 70 年代上演的警匪片)、《洛克福特档案》(The Rockford Files, 1974—1980 年上演的 123 集美国电视侦探片) 以及其它诸多的警匪片、侦探片和西部片时的那种温暖、舒适，甚至安全的感觉。因为我们之间很少有其他东西可以分享，和他一起收看这类电视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继父常常对他在电视上看到的场景、剧中人物发表意见，也常常对故事情节及其道德含义发表见解，这些都能触发他睹物思情，回想他自己的与其所见所闻发生共鸣的生活经历：他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纽约布鲁克林的成长经历；关于他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回忆；那些栩栩如生的部队和战争生活经历；战后生涯和其赌博经历，甚至是在他工作的纽约周围餐馆和保龄球馆内与那些自作聪明之流及政治家们的偶遇经历。当他与我一起收看体育节目时，我可以向他提供某支球队或某位球员的背景信息，以便他更好地理解我们正在观看的比赛。我告诉他为什么在一场橄榄球比赛中教练或门卫在某一时刻会选择某一种策略，告诉他在一场棒球比赛中击球手会寻求什么，或为什么投球手在不同的地点会投出不同的球。

在整个过程中，我的母亲很少插话，因为她一般不看这类电视。我们收看这类节目时，她总是在厨房里忙着。但当我们调台至“埃德·萨利文秀”及

其诸如此类的节目时，如弗兰克·赛那特拉(Frank Sinatra, 1916—1998, 美国流行歌星) 朱迪·嘉兰、迪安·马丁(Dean Martin, 1917—1995, 美国摇滚歌星)、鲍勃·霍普和小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 1925—1990), 美黑人摇滚歌星) 的节目时，情况就有所不同。这时候，我们三人会呆在一起观看，而我的母亲也会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她的父母如何从意大利移民并适应美国的生活；她早年在学校的时光；她与朋友们一起观看篮球与橄榄球比赛；她与她的兄弟姐妹们成长过程中做过的种种工作；她的狂欢舞会以及她如何学习厨艺并成为了一名美容师的故事。吃饭的时候、节假日或在为某人的生日举办的家族聚会上，我们会坐在一起看电视，这样的活动给我一种感觉，让我明白在我出生以前纽约的意大利美国社区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然而有时我们收看电视也并不专注于节目本身，也并不总是能勾起我上面描述的种种回忆。事实上，在家里，当我们走进房子时，我或是继父随手打开电视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就是说，当我在家时，绝大部分时间都让电视“开着”(奇怪的是，母亲一个人在家时并不喜欢看电视，她宁愿做家务，家务是她最喜欢做的事情。) 开着的电视机成为我们家的某种背景，我和继父，有时也包括我的母亲，会坐下来看上一小会儿，这取决于电视节目的吸引力；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我们都站起来来回走动，讨论或关注任何其他事情，而不是电视。我可能是三个人中最关注于电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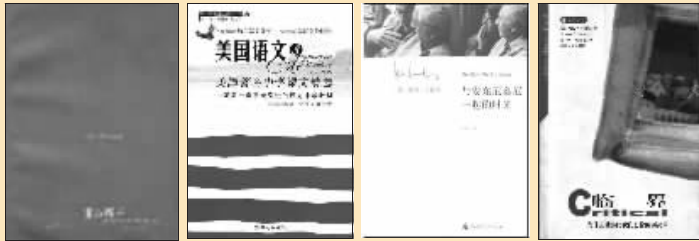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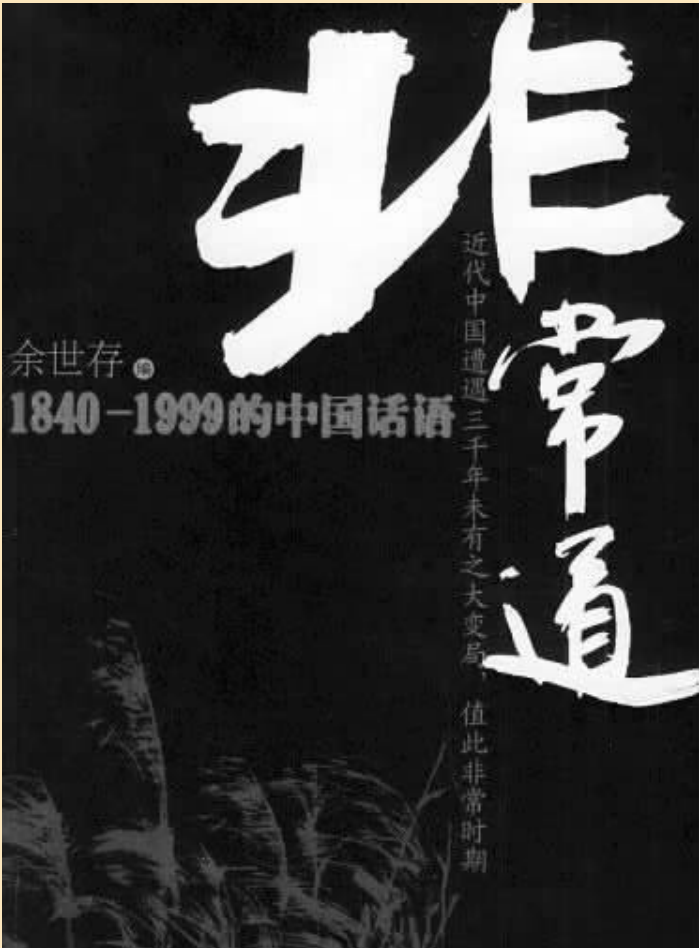
人，因为我最喜欢的节目——《阿博特和科斯特洛》(Abbott and Costello, 1936 年成立的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喜剧表演团体)、《索皮·塞尔》(Soupy Sales, 真名 Milton Supman, Soupy Sales 是以演员名字命名的儿童喜剧电视栏目) 和《超人》(Superman) 会在下午的晚些时候播出。但即便有这些节目，也并不影响我做其它事情，如做作业，或重新分类整理我收集的邮票和岩石，做分配给我的家务，或干脆读点什么。在家里，电视已经成为某种永久的存在。

有时我们也会想到，这样长时间地收看电视，我们就不能更好地利用时间做些更具建设性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电视给我们的的确太多了，它使我们了解更多的人、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事件；它使我们轻而易举地知道那么多的剧中人物的生活及其故事，因此尽管我们认识到电视的影响，但这样的认识却常常很快会消失。的确，没有人损失什么，我们还能在享受电视的同时找点别的事情来做。我的母亲和继父有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保龄球、他们的家庭和朋友；除了看电视以外，我有自己的爱好，我的亲戚、朋友，以及我们共同参与体育活动。所有的这些对于界定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而言都很重要，看电视这种习惯也是这样，除了能使我们呆在一起并培育一种整体意识之外，沉湎于电视有时会分散和减弱我们的精力而不能再去从事我们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活动。规律性地收看电视总是使我不能读书。电视不开着就不能和我的母亲和继父交谈，也不会醉心于那些岩石、邮票和玩具汽车、火车的世界里。现在我能明白这些东西比电视更令人痴迷，也不能带给我更多的回报，但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在情感上有点问题的家庭里，从事更具建设性的活动常常被扼杀在萌芽阶段，转而投向电视是最容易做的事情。所以，电视除了能让我们轻而易举地了解我们外部的世界之外，它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的空间，使我和我的家庭避免询问比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更具合理性的问题。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机工经营

机械工业出版社经分社
垂询电话：010-88379081
http://www.cmpbook.com



那种与生活本身水乳交融的实用。

“为你家的爱犬写一份简历”。“为自己的第一本书写一份突出自己背景和兴趣的简短的自传性概括”。“写一篇戏剧性独白，纳入人物的意识流思维和回忆”。“写一篇能够吸引听众注意力的宴会祝酒辞”。“以媒人身份写一封信，给一个女孩子介绍一个前景光明的伴侣”。“列出你保存了很多年的五件物品的清单，并写下保存的理由”。“记下一个口头故事”。“写出一份‘家庭聚会指南’，要求包括制定旅游路线、选择聚会地点、计划菜单、写清一次成功的家庭聚会的全部细节”。“写一篇用于悼念现场的颂词，需写出被悼念者独特精神价值”。

这些被开列在“微型写作”条目下的写作练习题让人耳目一新。与之对比，关于语文，我们通常惯性思维相形见绌而外，也十足荒唐。语文的有用恰恰在于那每一个俏皮的句法或每一个幽默的句法原本就浸润在我们生活的细节里，而语文学习只是重新发现了它们。就此而言，它所起

到的作用比诺奖平凡，却比诺奖重要。而在此之前，除了评职称之类的论文写作而外，更多时候，我们只不过将语文当作了一个功利之至的桥：它通向文坛、作协或那个无聊的被称之为“美女作家”之类的小圈子。而《美国语文》讲述的是，语文与畅销书乃至到大文化散文等全无干系。

《与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

[德] 维姆·文斯德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位电影大师写另外一位电影大师，日记体，亲切。如此“合作”非常罕见，你怎么能想像张艺谋和陈凯歌合作拍摄《九面埋伏》或《十一面埋伏》？或者反过来？或者，陈凯歌真就隆重推出自己的最新图书：《与张艺谋在一起的时光》？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相互致敬的习惯和传统。我们更没有表达焦虑、愤怒或抱怨的方式或仪式。在如此寡趣且剑拔弩张的人际语境中，这本寻常小书呈现的是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文化，面对它，只有钦羨。

《非常道》

余世存编著 / 社科文献出版社

余世存先生编著的《非常道》一书上市后口碑甚佳。在一个号称传播技术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的年代，“口碑”不仅没落伍，反而更珍贵。你我的书友、酒友、发小乃至顶头上司在“书”这件事上，基本没有瞎忽悠的动机。读完一本书，他们赞叹不迭，啧啧有声，无非是想与人分享一己欢欣。

《非常道》是一部传奇。它很容易成为书迷眼中最适合在厕所阅读的所谓“如厕书”。在“书迷”语境中，“如厕书”一直是个相当肯定的判断。《非常道》的琐屑与有趣，与很多年前“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的《艺林散叶》及多种续篇颇为近似。不同的是，余世存选事视野超越文林一隅，更斑驳也更辽阔。那些被小心翼翼苦心孤旨剪裁、拼贴而成的古今妙论不仅令人一唱三叹，同时，也意外反衬出当下“短信文化”独霸休闲语文的苟且与粗鄙。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冯友兰说，他的高寿秘诀就三个字：“不、着、急。”吴昌硕七十岁前曾纳一妾。时日不多，其妾即拂袖而去。吴慨叹说：“我情深，她一往……”这些闪烁着或明丽或暧昧人性之光的“非常道”有别于当下无数饭局上的无穷八卦乃至于日渐升级的情色谈资，并同时提示我们，在我们花样繁多的交流互动中，如是高端“谈资”已然稀罕。

《非常道》是一部索引。它像一组路标，仅止开列路径，却并未展露全豹。在《非常道》里，每句“神伤”都是一个带下划线的链接，每声“狂狷”也好似一个只要找到密码便可顺利打开的隐藏文件。尽管阅读个体无数打开链接、解密隐藏的思想风暴我们无从知晓，但那多半会是一番歧义风起云涌、真相大白天下的一团团裂变与混沌。书中无数“历史切片”本身当然无法撬动往事，但确是一根激活历史的杠杆。

《非常道》还是一部细节史，一部比某些正史更丰润、比某些宏大叙事更真切、比某些俨然的教科书更逼真的人性细节大全。它们在让人开颜、震惊、愕然的同时，也让人感慨在一个速度经济日益深入人心的年代里，那些被抽空了斑斓细节的人生恍如一只没有指纹的手，它乏味，空虚，不可信，更不可爱。《传奇》付印前，张爱玲下厂核红。那天，她一身奇装异服引起轰动。得意中，张爱玲告诉某女工：要想被大家在一大堆人中被关

注，就要去穿祖母的衣服。女工诧异不已：“穿祖母的衣服，那不跟穿寿衣差不多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只要别致就行……”

说实话，上面这个被余世存编入“虚荣”义项之下、人木三分的人性细节不仅远远胜过那些抄来抄去大而无当的“张爱玲传”，而且也让人再次明白，那些僵化的历史词条和章节为何不能担当索引真相之职——在那些被抽干了血气、枯干得连骨头都有些走形的“历史”中，没有“虚荣”和“性情”，没有“骨气”，更没有“变异”。

《重点所在》

苏珊·桑塔格著 /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文中最后一篇《论被翻译》精妙无比。作者的观点是，翻译是一种想像，一种拯救，一种积极的篡改，一种傲慢的扩张，一种合理的忠实，一种既忧伤又迷人的工作……在我狭隘的理解中，阅读，尤其是被艾柯定义为“误读”的那种阅读，也是如此，也是一种集合着想像、拯救、篡改、扩张的翻译。

《美国语文——美国著名中学课文精选》
马浩岚编译 / 同心出版社

美国中学生教材，一套三册。说到教材，我的联想多半糟糕。在我的印象中，因为总要与与时俱进，总在喜新厌旧，能留住的教材几乎没有，更何况是国外的教材。而编一套对人有用的好教材难上加难。就算我后来不再做教师，我也知道，一部经得起考验的好教材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教育质量。我一直认为，一部优秀的教材比成千上万的优秀教师更靠得住。大部分非文科院校毕业生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无法用娴熟的辞章句法分号逗号定语状语去适应他们的新生活，通常并非专业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使他们得以毕业的语文教材上。

而换一种说法或许更准确，那就是，一部好的教材，它本身就是一位不退休、不过时、不下岗的语文老师。而在《美国语文》中看见诸如 E.B 怀特、约翰斯坦贝克、约翰·阿普戴克、欧内斯·海明威等大作家的作品被依次收入，更明白在编者的理解中，文学的含义与功用远比我们习以为常的想像丰富和持久。在编者眼中，作为范本的语文既不是要把学生们都培养成美女美男作家，也不是仅仅将文学作为珍宝馆里的尤物，隔岸观火束之高阁，而是要让文学经典成为今人观察世间万象的一个视角，一个可以仿照、搬用的范本。为此，编者处心积虑处，无非处处强调它的实用——

阿尔吏·托夫勒 =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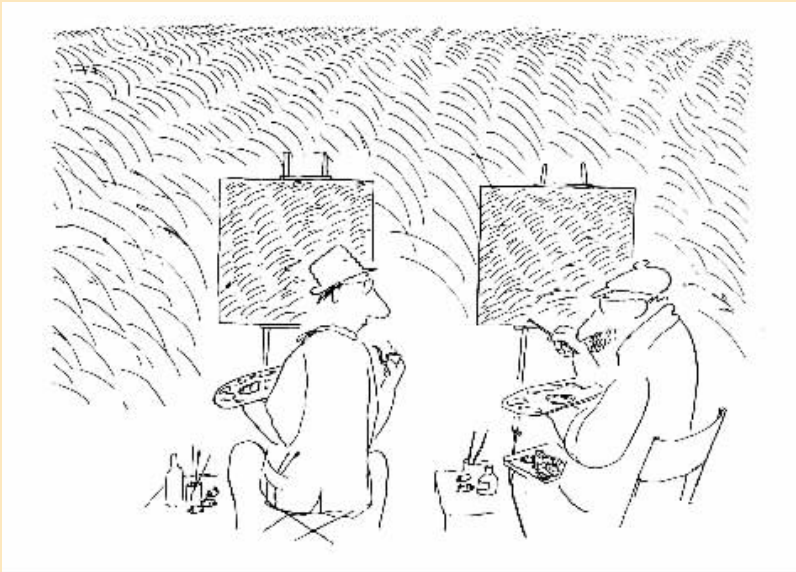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 5 月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细小的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

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就是我们常说的 *ceteris paribus*,即“设其他情况都相同”。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

但是,伊·普里戈金(由于对非平衡系统热力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获得了 1977 年诺贝尔奖)却不满足于仅仅把事情拆开。他花费了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试图去“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里具体地说,就是把生物学和物理学重新装到一起,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重新装到一起,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装到一起。

普里戈金 1917 年生于俄国,从 10 岁时起到比利时,在比利时长大成人,他身体结实,一头灰发,具有线条清晰的面容和像激光一样的力量。由于对考古、艺术和历史有很深的爱好,他把一种十分博学的思想带给了自然科学。他同他的任



从混沌到有序

工程师的夫人玛利娜和儿子帕斯卡住在布鲁塞尔,那里有一个跨学科的小组在忙碌着,他们正在一些互不相干的领域内(如蚁群的社会行为,化学系统中的扩散反应,量子场论中的耗散过程)探讨他的思想所包含的内容。他每年花一定的时间在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的普里戈金统计力学和热力学中心工作。由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
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
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
细小的部分。我们非常擅长
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
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

于他对来自非平衡系统中非线性过程的“耗散结构”所做的工作,他十分兴奋和喜出望外地获得了 1977 年诺贝尔奖金。

在《从混沌到有序》这本书中,普里戈金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里程碑——提供了一种能引起争论和激励思维的工作。这是一本充满远见卓识的书,书中闪闪发光的见解把我们许多最基本的假定推翻了,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使我们去重新考虑这些假定。

普里戈金的范式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在于它把注意力转向了现实世界的那些方面:无序、不稳定、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其中小的输入可以引起大的结果)以及暂时性——对时间流的高度敏感性。这些方面标志出今天加速了的社会变化。

童年:生死未卜

(上接 16 页)在悲观主义者当中,有一些最认真的人们,他们对美好的东西太过珍视,才如此忧心忡忡。但是显然,异议者大有人在。有人对电子媒体时代欢呼雀跃,认为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有人认为,“儿童的信息权、教育权、性自由的权利、经济和政治权利甚至选择家庭环境的权利应该还给儿童”。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所做的正是是要将“童年之死”合理化。

在这两种态度之间,大卫·帕金翰试图取一种踏实中允的态度。也许是身为专业学者——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教授,他的观点更为温和实际。帕金翰的著作中译为《童年之死》,而原文 *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 更能说明本书的思路。帕金翰提出,在电子媒体时代,一方面,儿童和成人之间的鸿沟消失,成人在儿童面前不再有秘密;但另一方面,儿童成为网络天然的学习者和拥有者,而成人(父母)反而被隔绝在这个世界之外,因此鸿沟再次出现,只是这一次,秘密属于儿童。情况比以前更加复杂。对此,帕金翰认为,过分乐观和过分悲观都有失偏颇。“童年”的概念确已消逝,但是在“童年”死后,还能做些什么呢?他提供了一些具体、现实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作为出路。

帕金翰提醒我们,许多研究结果是仅就英国而言。事实上,以上“童年”的生死,都是西方的概念。那

么,在中国呢?中国古代的儿童如何定义?“蒙学”在儿童成长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如今,物质在中国、尤其是大型城市的逐步繁盛,西学东渐之迅速,给人们一个错觉,似乎我们在分享着西方的当下。的确,大城市儿童正处于电子媒体时代儿童的境遇,然而,如何看待地区差异、贫富差异带来的儿童的不同命运?如何看待传统的力量?波兹曼们在凭吊“童年之死”,那么在中国,人们还未能确知童年的生死,还只是慌乱和困惑而已。

86 年前,鲁迅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实质上是对自我一代的反省、甚至谴责。儿童、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它关乎未来,关乎我们自身,关乎我们还有没有理想。

出版社新书目录



1. 《正在消失的历史》,经济观察报/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年 6 月
2. 《蓝海战略:超越产业竞争,开创全新市场》,金·莫博涅/著,商务印书馆,2005 年 5 月
3. 《赢》,杰克·韦尔奇/著,中信出版社,2005 年 5 月
4. 《公司中的创造力:创新型组织行动指南》,杰夫·莫奇/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年 5 月
5. 《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美]巴尊/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 5 月
6. 《行为的结构》,[法]梅劣-庞蒂/著,商务出版社,2005 年 5 月
7. 《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德]尼克拉斯·卢曼/著,2005 年 5 月
8. 《焦点不太准:卡帕二战回忆录》,[匈]卡帕/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5 月
9. 《你的水桶有多满》,[美]拉恩·克利夫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6 月
10. 《关于上班这件事》,朱德庸/著,中信出版社,2005 年 4 月
11. 《宏基的世纪变革》,施振荣/著,中信出版社,2005 年 5 月
12. 《再造宏基》,施振荣/著,中信出版社,2005 年 5 月
13. 《对称》,赫尔曼·外尔/著,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 年 6 月
14. 《20 世纪的精神教训》,[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6 月
15. 《单一的现代性》,[美]詹姆斯/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 5 月
16. 《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美]卢卡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5 月
17. 《18 岁给我一个姑娘》,冯唐/著,重庆出版社,2005 年 6 月
18. 《言论自由的反讽》,[美]费斯/著,新星出版社,2005 年 5 月
19. 《人和食物是平等的》,受俏/著,新星出版社,2005 年 4 月

Editor's Choice

本期荐书

《战时笔记》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

韩林合/编译

商务印书馆,2005年3月



想起维特根斯坦时,我脑中出现的

的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小个子男人,拥有一头凌乱的头发和桀骜不驯的眼神。他向卡尔·波普尔挥动着

随手拿起的拨火棍,因为语速过快而无人知晓他嘴里叫嚷的是什么。当罗素严厉地对着他叫喊,让他放下手中可能给周围的哲学家造成人身伤害的武器时,维特根斯坦站起身,穿过众人,摔门而出。这个男人是一个同性恋者,是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是每次维也纳哲学家聚会的话题掌控者,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同时还是把他赶出奥地利的希特勒的小学同学。多么奇妙的一个人!

《战时笔记》则向我们展示了维特根斯坦作为年轻人的一面。我认为不必完全懂得他在战火中所作的哲学思考——当然,如果有人以这作为阅读目的另当别论,只需要看看他写出的那些苦恼、困惑、同时抱着自信、伟大梦想的句子,就足以让阅读变得愉悦而满足。在他思想的建构时期,他不断的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完成这个工作,不断抱怨周围人的野蛮和愚昧,同时难以压抑自己的感性需求,可是又为此而自责。来自罗素和亲人的信会让他感到慰藉,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卑鄙包围”,他想保持自己的独立。他记录自己的工作时间和自己的收获,在不断袭来的沮丧和时刻重新恢复的自信中摇摆。即使他没能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

《福楼拜的鹦鹉》

[英]朱利安·巴恩斯/著,汤永宽/译

译林出版社,2005年1月

在这本说不清楚是小说是传记是散文集还是论文集的小书中,朱利安·巴恩斯发疯了一般卖弄着自己的才华和叙事技巧。他的叙事过于多样,以至于让我看不清楚他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本小书中夹杂着年谱、想象、推测、牢骚和议论。当我阅读完一半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明白为什么要以“福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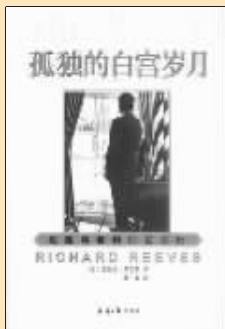
拜的鹦鹉”作为书名——这个名字更适合做第一章的名字而不是整本书的名字。我开始恶意揣测,是不是这位布克奖的得主拥有一位蹩脚的编辑,书的名字正是编辑所赐,而且由于某种原因一直流传下来。作为一名小说家,他对文学评论家的敌视也在这本书中表露出来,他恶毒地讽刺那些胆敢对福楼拜作品发出议论的评论家们,其中包括萨特——这位妄想同时作斯宾诺莎和司汤达的大人物,“像个壮健的、孤注一掷的救生员花了十年时间拍打他的胸部,把气息呼进他的嘴里;花了十年时间竭力想使他恢复知觉,这样他就能使他在沙地上坐直身子,确切地告诉他,他是怎么看待他的。”

总而言之,这本书显得不伦不类、过于花哨,不过无论如何你得承认,朱利安·巴恩斯这家伙还真有才华。

《孤独的白宫岁月:近距离看到的尼克松》

[美]理查德·里夫斯/著,蒋影/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9月



当91岁的马克·费尔特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水门事件中的“深喉”时,30多年前的新闻和政治事件再次引人瞩目。对伍德沃德和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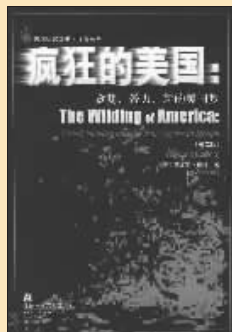
恩斯坦来说,那是最辉煌和最惊心动魄的时刻,而对于尼克松来说,则是最黯淡的时刻。通过阅读理查德·里夫斯的传记,读者会真正的走入尼克松的内心,真正了解这位总统当时所处的环境。你会发现,这位总统粗鲁、孤独、自我封闭、对媒体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感,同时他却拥有一位政治领袖最杰出的品质:勇气和决断力。而且尼克松尽管粗鲁,却不失风范,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马克·费尔特向《华盛顿邮报》透漏消息,这很早就为尼克松和他的班底所获悉。理查德·尼克松留给人的神秘感自然无法依靠一本书来驱散,即使你阅读了所有关于他的传记,可能也无法捕捉到他的真实想法和确切形象,但是这一本,的确是离尼克松最近的。

《疯狂的美国:贪婪、暴力、新的美国梦》

[美]查尔斯·德伯/著

何江胜、何烨、相华利/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



这个时代里,人们对财富的赞美以及‘财富产生的诱惑,远非是传统的约束力所能抵御的’。查尔斯·德伯这样说。在北京见到他时,他说,我们会喜欢这本书的,但是对我来说答案是否定的。这本书显然没有他对公司的研究那样卓越。他可能是过于急切地向自己心中的英雄怀特·米尔斯靠拢,过于想应用“社会学的想像力”,发展出一种不同于经济学的方式来阐释社会。他使用一个新的词语“wilding”来描述美国社会,这感觉有些危言耸听,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警告仔细思考却仍然具有意义,无论是对美国还是中国。

《言词而已》

[美]凯瑟琳·A·麦金农/著,王笑红/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安德里亚·德沃金的死亡让我重新拿起这本书,试图去了解这些女权主义者的真正想法。德沃金的偏执让人惊讶,因为她坚持认为,所有异性性交都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迫和歧视。麦金农是德沃金的合作者。她们合作设计并撰写的有关法规,将淫秽出版物视作对人权的一种违犯,加拿大最高法院认可了她们的看法。

在这本小册子中,麦金农试图论证的就是,色情文艺并不仅仅是“言此而已”,它构成了对女性实际的伤害。“色情文艺”并不能够被当作一种“言论”而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包括,因为它还包含着行动、歧视等含义。她想要指出的是,美国宪法对平等的保护才真正沦为“言辞而已”,谬误并没有像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指出的

那样,在与真理的交锋中总是处于下风,权力(包括出版权)在某些人群手中的集中,让谬误肆无忌惮嘲笑真理。

《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5年5月

《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美]周明之/著,雷颐/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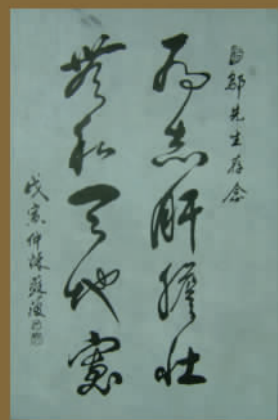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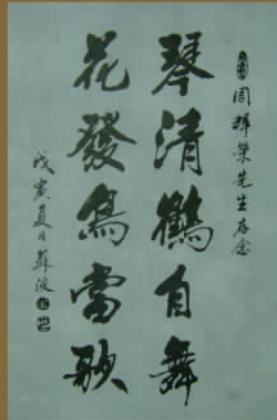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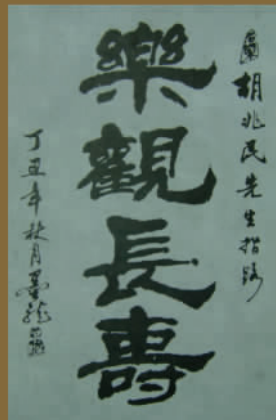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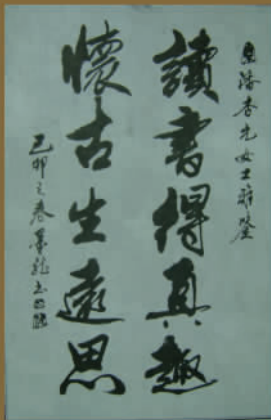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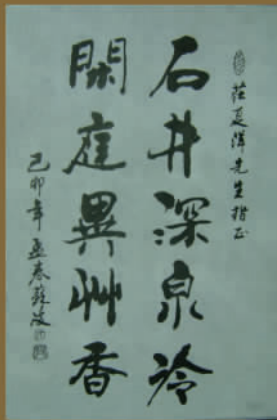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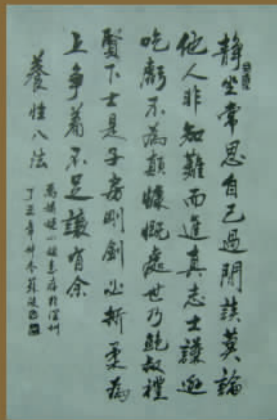


胡适一生的双重角色大可从他对唐德刚讲的一个故事中看出。他说,台湾青年写信给他,也只说:胡适先生,胡

适先生了。“这样也好。”胡适说。以前在大陆,包括唐德刚在内的人,对胡适的称呼却是:适之先生或者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师,而胡适先生却只是青年人的文化偶像罢了。唐德刚的话大抵如此。在这本口述自传中,适之先生却并没有大讲自己如何风光。当然,我们更容易瞩目的风光是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他同毛泽东的关系。后来的很多书都是着眼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而写的。而胡适此人却是最最希望能够远离政治的。这可真是个讽刺!胡适把口述的重点放在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治学方法上。在胡适看来,自己一生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 发动文学革命,作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2. 对思想史的研究(胡适自称自己喜欢把哲学史称为思想史),尤其是对禅宗史的研究。3. 对通俗小说的研究开风气之先。但是这些显然并不足以让胡适成为台湾青年口中的“胡适先生”,文化偶像。书的形势也很怪诞。唐德刚是口述历史的宗师级人物,通篇都是口述,形势自然如此,可是此君也是一位有自己见解的历史学家,于是就在注释中大发议论,往往都是反驳胡适的口述,读起来很有意思。而在周明之的研究之中,胡适显然就是以另外一种形象出现的,他是整个五四一代的领袖和代表人物。两本书以及唐德刚的注释对照着读,实在很有趣。

李翔=文

中国·北京·墨龙轩



《墨龙轩》画廊在北京开张不足两年，竟被众多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它是中国著名书法家苏波先生开辟的书画园地，主要展示个人作品，也有少量名人字画。这里的书画价格合理物超所值，所以回头客很多，还带来不少新客户。苏波先生的心态很好，他认为只要把画卖出去，挂在千家万户便知足了。至于价格，能高则高，不能高便低，皆亦然乐乎。故任何一个经济阶段的人都能在他们那里买到字画。

他为书法艺术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从没忘记小学时的启蒙老师王正元先生，王老师非常勤奋，一个人教一所初级小学，还有学前班，那时叫半年级。每天午饭后，王老师从不休息，总是在走廊上摆开课桌，为三四年级学生题写大楷。他在每一页大楷本的最上边认真地题写一行，让学生在下面临摹。半年级的小苏波总是挤到最前边看老师写字。王老师一边写一边讲：“点要像桃、撇要像刀”。他至今记忆犹新。王正元老师已年逾八旬，但身体还很健朗。苏波虽然不能经常去看望，但心里时常惦记着他的启蒙老师。说来也巧，上中学时又恰逢书法写得最好的王蕴珊老师带语文，每天一页大楷，又是一位很认真的老师。在这位老师的精心培育下，他学到了书写时的运笔、运气、藏锋、露锋、中锋、偏锋、方笔、圆笔、间架结构等等。在全校书法比赛中名列第二。以后又向当地书画名流求教，如天水市书协主席万惠民先生，文化馆长屈德洲先生、文联主席陈冠英先生、天水诗书画研究院院长董晴也先生等等。

由于他的勤奋和坚毅，书法艺术日见长进，在全国书法大赛中屡屡获奖。佳作奖、优秀奖、荣誉奖、华表奖、金杯奖、国家二等奖、国际三等奖、国际金奖、中欧文化特使奖等等不计其数。1986年进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深造三年，在函大教授刘炳森、欧阳中石、王遐举、赵嘉熹、姚俊卿等中国当代名流的指导下，书法作品日臻完善。掌握了书写时的抑扬顿挫，计白布黑，节奏韵味，神采妙趣，章法布局等高境界的追求。早在1976年底，光阴迫使他斗胆上街卖字画，开始时用最便宜的笔墨纸砚，每张字画成本5分钱，他竟然卖到1毛3分一张，当时觉得利太重了，决心要好好弹这根弦，没想到至今已弹了三十多年，而且越弹越响。收入越来越高，写字的劲头也越来越足。他在家乡卖了十多年，价位由每张1毛3分钱涨到每张5元。后来偶然听到在深圳每张字画可以买到10元，他便立即行动，背起文房四宝斗胆只身向神秘的深圳去了。在深圳每幅字画果真能卖10元，他惊呆了！钱怎么这样好赚呀？成本不足1元，卖10元，赚9元。有时还能卖到一百，甚至一千，一万。他曾看过《牧羊人》的电影，贫穷的主人公终于挣了大把的钱，老婆怎么也数不清。他便想，我何时也能挣大把的钱，让我老婆也数不过来，那该多好啊！真没想到从深圳回家时坐着波音飞机，当把钱交给老婆时，她居然真的数不清，他太高兴了。在深圳一干就是十个年头，为深圳电视剧《特区少年》题写了片名，在香港《大公报》和《东方日报》发表书法作品多次，为深圳、广州和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居67号千景画苑《墨龙轩》画廊
(燕莎向东1000多米，东风北桥东南边第一家二楼)
电话：画廊 010-64365169 (9:00-20:00)
住宅 010-64363853
移动：13552962806 邮编：100016
账号：中国银行北京市朝阳区支行燕莎中心分理处
4101800-0188-0074678 (户名：伏佐锋)

澳台书写巨幅招牌上百家。于1997年在香港出版了本人大型书法专著《苏波墨迹》一至二卷，两年便畅销一空。当时有位姓刘的画廊老板以月薪三万另加提成聘请他常年在画廊写书法，不料他却淡然一笑，拂袖而去。回到老家，又写了三本书稿，斗胆去北京找出版社，没想到三本书稿全部过关，于是《苏波墨迹》三至五卷在北京面世了。

在北京，他为很多高层人物题写书画，应邀为北京大学题写条幅四百余幅，为驻华使馆、星级酒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全国妇联等书写字画多幅。2002年10月，应邀携夫人张桂梅出席了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海外华人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庆座谈会”，受到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年，他的书法作品荣获国家权威机构颁发的ISO资质与ISE价质双认证，每平方米审定为360元，与市场价位基本吻合。2004年7月，应邀参加“中国文化艺术交流访问团”赴欧洲九国观光考察，并在德国成功举办了《中国文化艺术展》，苏波先生的所展作品全部高价售出，又饮酒挥毫，现场书写十多幅。他是参展人员中销售最好的。喜欢游览的苏波先生，乘坐空中客车，飞越了广阔的俄罗斯领空，鸟瞰了欧洲的万水千山；他登上了埃菲尔铁塔，一览巴黎全景，参观了艺术圣殿“卢浮宫”，瞻仰了宗教殿堂“巴黎圣母院”，象征胜利的“凯旋门”，深不可测的“卢森堡大峡谷”，令人仰慕的奥地利“马克思故居”，著名的“雨果酒店”，世界顶级画家莫奈、凡高、毕加索的原作，迷人的“蒙娜丽莎画像”，美丽的“维纳斯雕像”，高贵的女皇塑像耸立在维也纳广场中央，宜人的意大利“威尼斯海滨”，挺拔的“圣马力诺城堡”，秀珍小国梵蒂冈竟拥有“世界最大的教堂”。苏波先生从小就有出国梦想，今天终于梦想成真了。

同年9月底，应邀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三届中华杰出人物与海外华人华侨国庆座谈会暨中秋联谊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与合影，现场挥毫疾书，销售亦可观。特别是在联谊会上，应萨达姆表妹之邀，携手登台，起舞联欢，全场掌声雷动，节日主持人特别提出赞扬。

苏波是伏佐锋先生的字，其号曰墨龙，诗人，书法家，中国书法协会甘肃分会会员，东方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东方美术研究院书法部客座教授，中国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青少年书协徐州分会理事，香港华人企业家杂志社书画事务特派员，加拿大书画世协首批会员，香港皇室科学院荣誉博士。

他的书法作品及传略载入《国际现代书法集》，《中华人物辞海》等十多种大型辞书中。他的《墨龙轩》画廊有各种精品销售，还可以

现场创作，并有大型书法专著《苏波墨迹》三至五卷签名销售。
欢迎新老朋友光临选购，外地客户可来电邮购。

苏波先生被聘为美国北美第一开发集团上海代表处北京联络部主任。欢迎急需资金的企事业单位与苏波联络，可引进美国的资金。